

## 顧順章「自新」與「中統」的發展

林威杰

### 摘要

1931年中國共產黨召開六屆四中全會，在此會議前後黨內發生嚴重的路線紛爭，不少同志對革命路線的解釋不一，進而引發黨員的忠誠問題，讓不少共產黨人「轉變」投靠中國國民黨，成為反共的先鋒。其中以顧順章的「自新」，尤對中共造成巨大的威脅。

顧順章是中共特科負責人，對於特務工作有相當深厚的造詣。本文旨從不同視角分析造成顧順章「叛變」與「轉變」的因素，並探究他如何打造和強化了國民黨「中統」特務組織。至於這些「自首自新」人士，他們對「中統」的發展有無貢獻？國民黨是否真心接納這些人？面對「中統」的攻勢，中共又如何進行反擊、如何懲戒這些「叛徒」、如何重新凝結對黨的向心力？再者，因顧順章的門生故舊遍及國共兩黨，此一叱吒風雲的人物，為何最終走向悲劇命運？以往學界礙於特務工作的獨特性，且缺乏相關材料，難以討論國共兩黨的地下鬥爭。因「中統」日後在臺灣改組、重整為法務部調查局，本文即利用其度藏有關顧順章事件的相關材料，嘗試還原這段歷史原委。

關鍵詞：顧順章、中統、叛變、轉變、自首自新

# Gu Shunzhang's Defec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ent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and Statistics (CBIS)

Wei-jie Lin\*

## Abstract

Shortly before and after the Four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Six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in 1931, there was a serious dispute in the party over the correct “revolutionary line.” Many CCP members had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of approaches to revolution, and those who disagreed with the leadership were accused of being disloyal to the party. As a result, a large number of Communists surrendered themselves to the Kuomintang (KMT) and became active anti-Communists. Among them, the defection of Gu Shunzhang posed an enormous threat to CCP. Gu Shunzhang, who possessed remarkable skills and knowledge of clandestine work, was the person in charge of the CCP’s Special Operation Department at the time.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analyze the various factors that caused Gu Shunzhang’s “betrayal” and “conversion” and to explore how he subsequently helped establish and improve the secret service agency CBIS for the KMT. What contribution did these defected Communists make to the development of CBIS? Did the KMT accept them wholeheartedly? Facing attacks from CBIS, how did the CCP fight back? How did the CCP punish these “traitors” and reunite the party? Furthermore, as Gu Shunzhang was such a prominent figure with many students and friends in both parties, why did his life end so tragically? Due to the unique nature of secret service, few credible sources have been available for an academic study of the underground struggle between KMT and CCP. After the KMT moved to Taiwan, CBIS was reorganized into the Investigation Bureau under the Ministry of Justice, which still holds documents related to the Gu Shunzhang Affair in its archives. Using these materials, this article hopes to restore this important episode in history.

**Keywords:** Gu Shunzhang, CBIS, Betrayal, Conversion, Surrender

---

\* Postdoctoral Researcher, Department of History,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 顧順章「自新」與「中統」的發展\*

林威杰\*\*

## 壹、前言

顧順章（1904-1935）是中國近代史中的傳奇人物，他身為中國共產黨（以下簡稱中共）特科負責人，讓不少中國國民黨（以下簡稱國民黨）人命喪黃泉。但他為何最終選擇「叛變」，轉而投靠這個往日的「階級敵人」呢？討論顧順章案發生的前後因素，除了他本人性格原因外，此時中共黨內的忠誠問題也值得注意。1931年是中共發展的關鍵年份，在這一年召開了六屆四中全會，王明（陳紹禹，1904-1974）等留蘇學生上臺。也是在這一年，何孟雄（1898-1931）、顧順章、牛蘭（Hilaire Noulens，本名Рудник Яков Матвеевич、英譯名Yakov Rudnik，1894-1963）、向忠發（1880-1931）等共產黨人被捕，使得共產國際在遠東機構遭到嚴重的破壞，以及羅章龍（1896-1995）領導的「中國共產黨非常委員會」帶來黨內分裂的危機。除了內憂之外，中共還得面臨國民政府的軍事圍剿。相較於中共所面臨的困境，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中統」<sup>1</sup>前身，以下簡稱調查科）發展倒是順風順水。正是有了顧順章的加入，「幾使共黨各地之

\* 本文幸得兩位匿名審查人、南開大學歷史學院馬思宇博士與北京大學歷史學系盛差德博士提供寶貴意見，在此深表感謝。又，本文係（廣州）中山大學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資助「中統局與國民黨的派系政治」（19wkp45）階段性成果。

收稿日期：2019年12月8日；通過刊登日期：2021年2月2日。

\*\*（廣州）中山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後、助理研究員。

<sup>1</sup> 「中統」全稱為「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現名係由1938年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第一處改制而來。該局的第二處則繼承「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名義並進行改組擴充，簡稱「軍統」。兩個組織在發展過程中名稱屢有變更，本文為行文方便，部分論述以「中統」、「軍統」來概括。

地下組織全部瓦解」。<sup>2</sup> 顧順章更被調查科譽為「共黨陰謀之樞紐，對其黨內一切秘密，靡不知之詳盡」。<sup>3</sup>

「中統」創建目的是為了鞏固蔣中正（1887-1975）的領導權威，對內負責偵查黨內一切反對派，如改組派、地方實力派等；對外任務是消除一切威脅國民黨政權的潛在因素，其中以打擊共產黨更是工作的核心。「中統」身為國民黨的反共組織，卻在發展上與這些中共「轉變」分子相輔相成，「中統的作風和內部生活，無形中也受了中共的感染」。<sup>4</sup> 為此，要系統地瞭解國民黨特務組織的發展及其歷史脈絡，就繞不開這些中共「叛徒」，亦或者稱「自首自新」的「轉變」分子。礙於特務屬於情報組織而講求隱蔽性，導致在相關材料的蒐集上有一定的難度。現階段學界針對國民黨特務研究，主要著重在「軍統」，而「中統」則相對薄弱。這其中原因與檔案開放程度有限，以及取得相對困難有關。對此，中國大陸學者張憲文也感慨地提到：「坊間流行的大量關於民國時期特務活動的『紀實』、『演義』、『揭秘』類書籍，充斥書刊市場，內容混雜，虛實難辨，不僅搞亂了史實，混淆了視聽，而且給嚴肅的史學研究帶來了不必要的麻煩。」<sup>5</sup>

中共「叛徒」在中國大陸屬於敏感議題，研究有其禁區存在。再者，基於意識形態的立場，很難對這些中共「叛徒」有較為客觀的評價。如馬振犢的《國民黨特務活動史》，雖將國民黨的「中統」、「軍統」特務組織作系統的介紹，但在論及顧順章案上或中共「叛徒」議題上多半以批判為主。<sup>6</sup> 由於國民黨特務組織和中共特科等材料蒐集難度較大，特別是在1949年後這些核心檔案被帶往臺灣，限制此書作者的史料運用。

過往曾參與顧順章案，以及經歷過中共這股「自首自新」的「轉變」風潮的

<sup>2</sup> 「陳立夫參加抗戰準備工作之回憶」（1977年7月29日），〈任總統時：函（六十六年）（一）〉，《嚴家淦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6-010806-00006-012。

<sup>3</sup> 中國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編，《中國共產黨之透視》（臺北：文海出版社，1982年影印本），頁316。

<sup>4</sup> 萬亞剛，《國共鬥爭的見聞》（臺北：李敖出版社，1990年），頁305。

<sup>5</sup> 馬振犢，《國民黨特務活動史》，上冊（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修訂本），扉頁。

<sup>6</sup> 馬振犢，《國民黨特務活動史》，上、下冊。

人不在少數。這些人的回憶就頗為重要。例如在處理顧順章案過程中，徐恩曾（1896-1985）、蔡孟堅（1905-2001）、王思誠、萬亞剛、張國棟<sup>7</sup>等人皆曾參與。這些人是當時調查科負責人、幹員，因此在他們的回憶文章裡對顧順章有不少著墨。但仔細比對後，彼此內容又有不少出入。如徐恩曾和蔡孟堅在錢壯飛（1896-1935）議題上選擇避重就輕；又如張國棟，他於1949年後滯留中國大陸，因此在回憶中有不少隱晦之處。人物的回憶材料或是文史資料等，雖存在當事者隱惡揚善的缺點，甚至可能虛構，如陳永發也提到：「我認為敵對方的資料很難排除造假污蔑的可能。」<sup>8</sup>不過這不能說回憶材料就無法使用，相信只要細心琢磨，必然可以發現珍貴之處，如何剔除「石頭」與「沙子」而挑出「美玉」，則成為研究者所必須思考的課題。

目前「中統」檔案藏於其後身法務部調查局（以下簡稱調查局），因調閱資料有其程序，造成材料取得相對不便，但仍有部分學者利用調查局檔案完成不少成果。例如，郭華倫（1909-1984）的《中共史論》、<sup>9</sup>王健民所撰《中國共產黨史》（原名《中國共產黨史稿》）<sup>10</sup>與陳永發所著《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sup>11</sup>等。這三部著作是參考調查局檔案完成的代表，但因為是屬於通史類型，內容對這些中共「叛徒」在「轉變」後，於國民黨特務組織發展的貢獻討論有限。調查局藏有顧順章案的卷宗，以及中共「叛徒」的自白與宣言等材料，這就顯得十分珍貴。

拙文〈特務、叛變與轉變：國共鬥爭下的顧順章案〉，內容曾對國共特務工作有初步的介紹，並對顧順章「叛變」、「轉變」及其影響做了研究，還探討了他遭南京當局處決的前因後果。<sup>12</sup>但對顧順章「叛變」原因的分析較少，也未論

<sup>7</sup> 1949年政權更迭後，張國棟因滯留中國大陸，遭中共當局逮捕，改名張文，以下仍稱「張國棟」。

<sup>8</sup> 陳永發，〈延安的「革命鴉片」：毛澤東的秘密武器〉，《二十一世紀》，2018年8月號（總第168期），頁44。

<sup>9</sup> 郭華倫，《中共史論》，第1-4冊（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1973年）。

<sup>10</sup> 王健民，《中國共產黨史》，第1-3冊（臺北：漢京文化公司，1988年）。

<sup>11</sup>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上、下冊（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1年修訂版）。

<sup>12</sup> 林威杰，〈特務、叛變與轉變：國共鬥爭下的顧順章案〉，《政大史粹》，第32期（2017年9月），頁57-108。

及中共黨人「自首自新」的背景與影響。因此，本文嘗試以顧順章為核心切入，利用調查局典藏的相關文件，配合當事者的回憶性文章等，來探討這段歷史的發展，希望跳脫以往對中共「叛徒」的既定印象，同時釐清這些中共「轉變」分子對國民黨特務組織發展的功與過。

## 貳、顧順章的「叛變」與「轉變」

所謂的「叛變」與「轉變」，是指不同意識形態政黨對主義的信仰，以及對黨員在忠誠問題上的要求而產生的差異。國共兩黨皆屬於列寧式政黨，三民主義與馬克思主義分別代表彼此的信仰，這種信仰又有別於西方民主政黨，它更強調黨員的忠誠與黨領導的權威。舉例來說，顧順章在中共眼中被視為「叛徒」，然而在國民黨看來卻是「自首自新」的「轉變」分子。基於這樣的立場，為何在國共鬥爭期間黨員在思想上發生轉變？僅僅是因為生命遭受威脅？或是黨內路線衝突？派系鬥爭？想必其中有更複雜的因素存在。

這些「叛變」或「轉變」分子，每個人在路線抉擇上都有不同際遇與立場，以顧順章來說，他被稱為自中共成立以來最危險的「叛徒」，造成中共中央安全「從未有過的極大威脅的事件」。<sup>13</sup> 為此，中共中央在上海處境困難，甚至一度陷入停擺狀態。<sup>14</sup> 顧順章領導中共特科站在第一線與國民黨做生死搏鬥，他所率領的「紅隊」<sup>15</sup> 是中共用來懲戒「叛徒」，打擊國民黨的利刃。那麼，顧順章為何最終會由懲戒「叛徒」，轉變成為「叛徒」？這可以從當時中共黨內路線衝突與顧順章個人性格兩方面去探討。

<sup>13</sup> 金沖及主編，《周恩來傳》，第1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20年1月第3版2刷），頁260。

<sup>14</sup>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周恩來年譜（1898-1949）》（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20年修訂本），頁207。

<sup>15</sup> 紅隊又稱「打狗隊」，全稱為「紅色恐怖隊」。主要工作是用來懲戒「叛徒」與對付「奸細」，以保衛黨組織的安全，必要時也從事綁架工作，以勒索贖金來籌措黨的經費。參見顧順章，《特務工作之理論與實際》（1933年7月20日），法務部調查局藏，檔號：257.3/692/087044，頁189-190。

## 一、中共黨內路線衝突

中共的創建是世界共產革命中的一環。由於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因此莫斯科在中共黨內便有舉足輕重的話語權，而十月革命的經驗是中共黨人效仿的對象。中共自成立那一刻起，國際路線便是革命成功唯一的道路，是代表「正確的」不容質疑的革命路線。然而這樣的準則卻在1930年時被李立三（1899-1967）給打破。

立三路線不僅挑戰了共產國際的權威，也引起黨內同志的不滿。有鑑於當時世界經濟大恐慌，加上中原大戰的爆發，讓實際掌握中共中央權力的李立三斷定「革命高潮已到了」，「在全國革命高潮之下，革命可以在一省或幾省重要省區首先勝利」。<sup>16</sup> 在他的號令之下，全國共產黨組織都動員起來，由彭德懷率領的紅軍甚至一度攻陷長沙。<sup>17</sup> 面對這樣的勝利，李立三志得意滿，「認為自己是中國的列寧」，他批評蘇聯人「對城市估量不足，對革命形勢估量不足」。李立三要求共產國際改變路線，立即發動世界革命，否則就是背叛革命。<sup>18</sup> 不僅如此，「李立三動員所有的負責同志和全黨來反對共產國際。他公開把黨和共產國際對立起來。他拒絕執行共產國際的決議，而政治局不顧並反對共產國際的堅定不移的指示」。<sup>19</sup>

李立三這樣的舉動在共產國際的眼裡「是荒誕和危險的」。史達林（Иосиф Виссарионович Сталин，1873-1953）批評立三路線的執行「簡直是胡鬧」，

<sup>16</sup> 「柏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關於政治任務決議案草案內容的報告」（1930年6月9日）、「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首先勝利」（1930年6月11日），收入（中共）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6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頁98、121-122。

<sup>17</sup>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給中共中央的信」（1930年8月1日），收入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譯，《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1927-1931》，第9卷（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年），頁249。

<sup>18</sup> 「斯托利亞爾給洛佐夫斯基的信」（1930年8月5日），收入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譯，《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1927-1931》，第9卷，頁260；「柏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關於政治任務決議案草案內容的報告」（1930年6月9日），收入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6冊，頁101。

<sup>19</sup> 「斯托利亞爾給洛佐夫斯基的信」（1930年8月5日），收入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譯，《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1927-1931》，第9卷，頁257-258。

「中國人急於攻佔長沙，已經幹了蠢事。現在他們想在全中國幹蠢事。絕不能容許這樣做」。<sup>20</sup> 為了不讓「蠢事」繼續下去，為了奪回控制權，共產國際將人在莫斯科的周恩來（1898-1976）與瞿秋白（1899-1935）派遣回國。由他們主持召開的六屆三中全會，就是將中國共產黨引導回「正確」國際路線的一次嘗試，但這卻引來了「調和主義」的紛爭。黨內工運領袖何孟雄（1898-1931）不滿黨中央在立三路線上的曖昧態度，加上江蘇省委書記一職被資歷、經歷都尚淺的王明奪走。由於江蘇省委是中共黨內經費最多，資源最豐富的機構，誰掌握這個職缺，誰就能在黨內有發言權。這讓本該志在必得的何孟雄感到憤怒。王明等人也不滿三中全會僅是「公開地或半公開地捍衛和粉飾」立三路線，於是他希望得到莫斯科的幫助，因為「來自上面的壓力具有重大影響」，而此刻中共內部正在「爆發的一場極其嚴重的鬥爭」。王明認為如果再不對原有領導機關進行認真的改組，「貫徹執委路線是不可想像的」。<sup>21</sup> 為了澈底解決立三路線所帶來的政治風波，王明最終盼到自己老師米夫（Паве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Миф，1901-1938）的來華。<sup>22</sup>

共產國際代表米夫主持召開的六屆四中全會，由血統「最純正」的留蘇學生取得黨內控制權。那麼這次會議應該是代表「最正確」、「最無庸置疑」的革命路線。但事實卻並非如此，這場會議被中共官方定義為「沒有任何積極的建設的作用」。<sup>23</sup> 六屆四中全會是一次「以王明為主要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在中共中央佔據統治地位的開端」，而這場會議在一片爭議聲中拉開帷幕。<sup>24</sup>

<sup>20</sup> 「斯大林給莫洛托夫的電報」（1930年8月13日），收入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譯，《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1927-1931》，第9卷，頁300。

<sup>21</sup> 「陳紹禹給薩發羅夫、米夫、馬季亞爾、馬耶爾的信」（1930年12月17日），收入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譯，《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1927-1931》，第9卷，頁540-541。

<sup>22</sup>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信」（1930年10月20日），收入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譯，《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1927-1931》，第9卷，頁393。

<sup>23</sup> 毛澤東，〈附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1945年4月20日），《毛澤東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頁963。

<sup>24</sup>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第1卷（1921—1949），上冊（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頁310。

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在「事先連鬼也不知道」的情況下召開，「王克全（1906-1939）、何孟雄、羅章龍（1896-1995）、王鳳飛（1903-1933）、徐錫根（1903-？）這班搗蛋鬼，到了會場聽到國際代表——米夫報告開會意義後，才明白是開四中擴大會議」。這樣的舉動讓與會代表們感到不受尊重，而且異常憤怒。但此時顧順章率領荷槍實彈的特務隊和武裝「在那裡鎮壓」，才讓會議得以順利進行。<sup>25</sup>

值得注意的是，六屆四中全會是由顧順章率領的特務隊維持秩序才得以順利召開。由此推斷顧順章理應支持這次會議，無論他是出自於上級長官的命令，或是懾於共產國際權威，亦或者是個人意願。因為顧順章這樣的舉動已經得罪黨內不滿四中全會合法性的反對派，這就導致他成為黨內的眾矢之的。

再者，同年1月17日，反對王明最劇烈的何孟雄等人在上海東方旅社開會，因為「叛徒」的告密而遭到國民政府捕獲，最終在2月7日被處決，是為「龍華二十四烈士」。至於這個「叛徒」即為唐虞，亦稱王掘夫，是中共特科的成員。中共特科主要任務是「保護黨的組織的安全，和黨的政治路線的發展」。<sup>26</sup> 照理說身為負責人的周恩來與顧順章，在何孟雄等人的事情上理應作出交代，但問題的矛頭卻指向了王明。

王明一開始不僅開除了何孟雄的黨籍，且稱這些被捕被殺的人是「咎由自取」。<sup>27</sup> 當時中共特科由周恩來、向忠發與顧順章三人組成的特務會議領導。<sup>28</sup> 周恩來是主要的負責人，顧順章是實際執行者，也只有周恩來能指揮得動顧順章。六屆四中全會的召開，與後來王明等留蘇學生能順利在黨內掌權，周恩來是

---

<sup>25</sup> 小林，《四中全會前後共黨分離情形》（1931年3月），法務部調查局藏，檔號：260.07/815/12322；我聞，〈現代史料：傳共黨非常委員會〉，《社會新聞》，第2卷第4期（1933年1月），頁40。

<sup>26</sup> 顧順章，《特務工作之理論與實際》（1933年7月20日），檔號：257.3/692/087044，頁187。

<sup>27</sup> 陳修良，〈我所經歷的立三路線的失敗一回憶錄《我走過的道路》（五）〉，《世紀》，2020年第2期（2020年2月），頁36；劉曉，〈黨的六屆三、四中全會前後白區黨內鬥爭的一些情況〉，《中共黨史資料》，第14輯（1985年5月），頁105。

<sup>28</sup> 顧順章，《特務工作之理論與實際》（1933年7月20日），檔號：257.3/692/087044，頁186-187。

關鍵人物。何孟雄等人的被捕，一直有傳言是王明派人向國民黨當局告密或是知情不報，用國民黨的手來「借刀殺人」，如此不僅能剷除黨內的反對派，又能宣傳國民黨迫害黨內同志。<sup>29</sup>

調查科曾經將這些被捕者的口供、自白或宣言編撰成《轉變》一書，統計時間從1931年春至1933年夏，總共搜羅300位中共「轉變」分子。有趣的是這些宣言中有很一部分是批判六屆四中全會，攻擊王明的領導。這些「轉變」分子被捕時間前後不一，彼此在黨內路線也不同，但他們卻統一口徑地反對王明，這說明六屆四中全會的確給中共帶來不小影響，也表示留蘇學生在黨內權力的合法性是遭到質疑的。<sup>30</sup>

周恩來「作為一個最聰明和最講究實際的人」，當李立三倒臺後，局勢逐漸對王明有利，加以共產國際代表米夫的來華，善於掌握政治風向的周恩來，自然明白召開六屆四中全會所代表的意義，所以他選擇支持王明。再者，何孟雄等反對派有分裂黨內團結的疑慮，這也讓周恩來在處理「龍華二十四烈士」的問題上顯得相當謹慎。他既要維繫黨內和諧，又必須鞏固黨中央權威。鑑於周恩來在黨內的地位，他成為留蘇學生與反對派之間溝通的橋樑。<sup>31</sup> 這一點可以從這些「轉變」分子的自白或宣言中看出，裡面很少批評或攻擊周恩來。<sup>32</sup> 由此可見周恩來的政治手腕之高明。

至於顧順章在六屆四中全會的政治清算中，仍順利當選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並沒有受到立三路線後黨內衝突過多的波及。<sup>33</sup> 「國際派因得顧的幫助，雖

<sup>29</sup> 關於王明在六屆四中全會前後的角色可參見林威杰，〈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前後的黨內派系衝突〉，《展望與探索》，第17卷第9期（2019年9月），頁36-63。另根據郭德宏編撰的《王明年譜》表示，學界對王明在何孟雄等人被捕告密一事，目前尚無定論，但多方證據皆顯示王明很難撇清責任。郭德宏，《王明年譜》（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頁189-196。

<sup>30</sup> （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編，《轉變》（1933年12月），法務部調查局藏，檔號：245.3/841/14824。

<sup>31</sup> 金冲及主編，《周恩來傳》，第1卷，頁255-256。

<sup>32</sup> 請參見中央組織部調查科編，《轉變》（1933年12月），檔號：245.3/841/14824。

<sup>33</sup> 王健英編，《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匯編—領導機構沿革和成員名錄》（北京：紅旗出版社，1983年），頁146。

在極度的紛亂中，但仍能成一小朝廷」。<sup>34</sup>此外，從顧順章在1933年發表的〈前共黨中委顧順章告中共青年書〉來看，他顯然與向忠發有一定程度的嫌隙。顧順章不滿周恩來與李立三縱容向忠發利用黨內資源亂搞男女關係，還提到中共領導層彼此間的「爭權奪利」，「不顧中國的環境，只任性的瞎幹，把整千整萬的工人和農民，供其盲目的犧牲，結果弄得個個妻離子散，家破人亡，使全國民眾痛恨共黨，仇視共黨，這豈是革命的本旨麼？」正是由於這樣的原因，才讓顧順章「為要解放我精神上的痛苦，為要貫徹我參加革命的初衷，所以經過長期的考慮以後，便毅然決然的離開你們而轉變了」。<sup>35</sup>

通常自白書或宣言等的宣示意義大於實際意涵，因此，上述顧順章談的內容不可全信，即便他自稱「共黨中我自認的確是最忠實的一個」，相信這樣的說法很難說服人。但顧順章於1931年4月被捕「叛變」，在此之前中共剛經歷立三路線以及四中全會後的政治危機，黨內人心渙散，「開始出現消極情緒，走投無路，絕望，各種各樣的人逃離」。<sup>36</sup>正是如此的環境，才讓顧順章在自白書稱：「簡單的說，就是對共產黨一切的一切，都使我失望，使我灰心！」<sup>37</sup>因為失望而出走，似乎就顯得有所依據。

## 二、顧順章個人性格

要瞭解顧順章性格，首先得從他的背景探討。顧順章是上海吳淞人，機械工人出身，1923年加入中共擔任職工任務，曾赴蘇聯接受「克格勃」<sup>38</sup>訓練。

<sup>34</sup> 未明，〈現代史料：顧順章被捕前後之匪黨〉，《社會新聞》，第5卷第3期（1933年10月），頁37。

<sup>35</sup> 「前共黨中委顧順章告中共青年書」，中央組織部調查科編，《轉變》（1933年12月），檔號：245.3/841/14824，頁60-65。

<sup>36</sup> 「陳紹禹給薩發羅夫、米夫、馬季亞爾、馬耶爾的信」（1930年12月17日），收入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譯，《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1927-1931》，第9卷，頁540。

<sup>37</sup> 「前共黨中委顧順章告中共青年書」，中央組織部調查科編，《轉變》（1933年12月），檔號：245.3/841/14824，頁62。

<sup>38</sup> 蘇聯情治機構，Объединённ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 при СНК СССР，中譯為「蘇聯人民委員會國家政治保衛總局」。

聯俄容共期間擔任共產國際駐廣州代表鮑羅廷（Михаїл Маркович Бородин，1884-1951）的秘密侍衛，因而受到賞識。1926年北伐開始，他奉派返回上海主持工人糾察隊，1927年任上海第三次暴動總指揮。清黨後，他到武漢任中共中央軍委會委員，不久返回上海主持特務工作；<sup>39</sup> 1928年中共六大後當選中央委員兼特務工作負責人。<sup>40</sup>

一開始國民黨稱顧順章是上海工人中最有力量的共產黨員，「他的手段非常毒辣、殘忍，死在他手中的人，真不知多少。清黨以後，他轉入地下工作，一直沒有消息，但是他已成為中共首腦部的特務頭子，僅僅受周恩來（當時中共在上海總負責人）的直接指揮」。<sup>41</sup> 此時中共特科人數不算多，但在顧順章的領導之下，「不但保障共黨工作進行，還給政府方面人員幾次重大損害，顧氏聲名，遂待〔傳〕播海上〔上海〕」。<sup>42</sup> 這樣棘手的人物給國民政府造成不小的困擾。

1931年3月，顧順章在周恩來的指示下，負責護送張國燾（1897-1979）與陳昌浩（1906-1967）前往鄂豫皖蘇區。當時中共中央在上海，各地蘇區則分散於全國各地。這些蘇區與中共中央之間建有完整的交通網絡，而顧順章是實際主持交通網的負責人。根據張國燾的回憶：「我還是在五卅運動時與顧順章認識的，那時我就很欣賞他的能幹，這次重逢，已相隔五年多了，他的才華更是令人佩服。不過他的儀表談吐，多少有些海派氣味，也許這點是他為人美中不足之處。」<sup>43</sup>

在送走張國燾與陳昌浩後，顧順章利用「化廣奇」、「李明」等化名在漢口登臺表演魔術。顧順章以魔術師的形象走紅漢口，「他魔術高超，頗獲社會方面的好評，他是一個中等身材，肥胖結實的二十八、九歲的上海人，他口齒伶俐、手法巧妙，他每次登臺總是化妝成一個西洋人有高鼻子及小鬍子。」這讓不少達

<sup>39</sup> 「中共特務部部長顧順章之自首及其與中共之打擊」，（國民黨）中央調查統計局編，《有關顧順章等破案經過》，法務部調查局藏，檔號：276/7435/59400；「顧順章簡歷」，中央組織部調查科編，《轉變》（1933年12月），檔號：245.3/841/14824，頁60。

<sup>40</sup> 王健英編，《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匯編—領導機構沿革和成員名錄》，頁98。

<sup>41</sup> 「中共特務部部長顧順章之自首及其與中共之打擊」，中央調查統計局編，《有關顧順章等破案經過》，檔號：276/7435/59400。

<sup>42</sup> 無悔，〈顧順章軼史〉，《中外問題》，第15卷第3期（1936年4月），頁139。

<sup>43</sup> 張國燾，《我的回憶》，第3冊（北京：東方出版社，1998年），頁3。

官顯要都曾拜他為師。由於顧順章行事過於高調，引起了調查科駐派武漢人員注意，「他來往的頗多是武漢方面過去有重大共黨嫌疑的人物，而他對於國民黨的軍政及黨務社會又無所不談，因此確定這個人可能是共黨的重要份子，但是李明與當時武漢上層份子亦頗有往來，還頗受他們的庇護」。<sup>44</sup>

1931年4月下旬，在中共「轉變」分子尤崇新（?-1931）的指認下，顧順章遭到調查科逮捕。他在被捕過程中倒也沒有反抗，而是表現的從容不迫。由於中共對國民黨有一定程度的滲透，顧順章瞭解蔡孟堅係調查科在武漢地區的負責人，第一時間便要求見他。據蔡孟堅回憶稱：「我即傳顧來，見顧只說：『我有對付共產黨大計劃，請你速安排本人晉見總司令蔣公，我將當面陳情。』他態度冷靜，不願再言其他。」但蔡孟堅急於邀功，將顧順章被捕一事彙報武漢行營主任何成濬（1882-1961），隨後又電告南京本部，導致消息遭中共潛伏在調查科人員錢壯飛所截獲，而有了應付時間。<sup>45</sup>

顧順章在被捕瞬間並沒有表現緊張慌亂，反倒是冷靜沉穩，且在思想上快速轉變。再者，他明白此時唯有見到蔣中正才能確保自己的人身安全，如果再獻計協助國民黨來剿滅共產黨，那麼身價勢必水漲船高。「顧氏是很聰敏的，被捕之後，立刻決議自新。並願暴露共黨的秘密，他想用別人的血，贖他自己的罪。」<sup>46</sup> 但一切如意算盤卻毀在蔡孟堅立功心切上，否則中共勢必得面臨更為嚴峻的危機。蔡孟堅在多年後回憶與張國燾及陳獨秀（1879-1942）二人一起談論過顧順章，「他們一致認為顧是共黨中優異分子，手腕之靈，手段之辣，較周恩來有過之無不及。」<sup>47</sup>

當調查科負責人徐恩曾接到顧順章被捕消息時「興奮得跳起來」，同時下令將人帶回南京。據徐恩曾稱：「在見他以前，我已確定計劃要爭取這個人。」在經過徐恩曾「懇切」的談話後，顧順章不到兩小時便答應了「轉變」。顧順章

<sup>44</sup> 「中共特務部部長顧順章之自首及其與中共之打擊」，中央調查統計局編，《有關顧順章等破案經過》，檔號：276/7435/59400；張國燾，《我的回憶》，第3冊，頁5。

<sup>45</sup> 蔡孟堅，〈兩個可能改寫中國近代歷史的故事〉，《傳記文學》，第37卷第5期（1980年11月），頁43-44。

<sup>46</sup> 無悔，〈顧順章軼事〉，《中外問題》，第15卷第3期，頁139。

<sup>47</sup> 蔡孟堅，〈兩個可能改寫中國近代歷史的故事〉，《傳記文學》，第37卷第5期，頁43。

給徐恩曾第一印象是：「他對共產黨的『主義』並無深切的瞭解，因而也並不怎樣熱烈的愛好；他在特務技術方面雖有驚人的造詣，但對政治認識卻極簡單幼稚。」<sup>48</sup> 確實如徐恩曾所言，無論是共產黨亦或者國民黨都對顧順章在特務技術上的才能感到欽佩。徐恩曾在後來的回憶錄中，曾這樣形容他在特務方面的能力：

他在這一方面的天才、聰明、機警和技巧都是高人一等，因此造成他特務工作的卓越才能，他精於射擊，能設計在房內開槍而使聲音不達於戶外。他可以用兩手輕巧地捻死一個人而不顯露絲毫痕跡。他對各種機器的性能都很熟悉，對爆破技術有獨到的研究。這一切，使顧順章成為赤色特務中空前絕後的人物。<sup>49</sup>

又，調查局所藏顧順章案卷是這樣記載：

顧順章是一個具有特務天才的人物，他聰明、機警、技巧都是高人一等，精於射擊，他能設計在房間內射擊而使音響不達戶外，對於各種機器的性能，亦頗瞭解，何者是重要部門，如何爆破損壞，俱有深切之研究，對於人事調查，他是主張不擇手段專講目的的。倫理、道德等等觀念，在他特務工作的理論上是認為落伍不切實際的，他陰險兇惡猜忌腐敗無所不為，絕無顧忌，在他鷹隼的鼻尖與凶光四射的兩目上以及在他日常的生活上，完全可以看出來，他是不馴服的人，對於中國固有的文化及道德的修養是沒有的，他是十足具有支配慾、領袖慾、享受慾、殺人狂，貪得權勢享受無饜的唯物主義者，我們道德修養及主義方面對他的薰陶實在不合他的脾胃。<sup>50</sup>

調查局這份檔案沒有註明報告撰寫者是何人，但根據內容基本可以推論應該為徐恩曾所寫，亦或者是他參考此檔案寫了後來的回憶錄。徐恩曾對顧順章描述內容雖略有誇張，但不能否認的是顧順章在特務工作上確實有其卓越能力；否則貴為國民黨特務組織領導人之一的徐恩曾，也不會給一位中共「投誠」分子如此高的評價。

<sup>48</sup> 徐恩曾，《我和共黨鬭爭底回憶》（臺北：編著者發行，1953年），頁19。

<sup>49</sup> 徐恩曾，《我和共黨鬭爭底回憶》，頁20。

<sup>50</sup> 「中共特務部部長顧順章之自首及其與中共之打擊」，中央調查統計局編，《有關顧順章等破案經過》，檔號：276/7435/59400。

在性格方面，顧順章被描繪為「擅於交際，說話很風趣，處世經驗豐富到和他的年齡不相稱的程度，人情味很濃厚，善於揣摩人的心理，對人的態度永遠是那麼和藹、誠懇，而使人樂於和他親近」，「懂得社會上各種組織門檻」，「三教九流無所不包」。但顧順章的另一面，徐恩曾是這樣形容：「為人陰狠毒辣，死在他手下的同志不知凡幾，同黨的人將他比作餓了要吃人，飽了要打架的豺狼，人人都畏懼他。當我和他相處較久以後，發現他有強烈的領導慾、享受慾和殺人狂也是他的特性之一。」<sup>51</sup>

「轉變」後的顧順章，非但沒有陷入人生的低潮，反倒為他事業帶來新的高峰。調查科幹員黃凱對顧順章有這樣的描述：「1、他對特務工作確有精明之處，如經他所繪圖監製的各種假髮、假鬚、假牙等化妝用品，用起來唯妙唯肖；2、培養特工人員，有一套辦法，成效快；3、鼓其如簧之舌，堅決表示以後終身反共。」<sup>52</sup> 顧順章保鏢林金生也回憶說：「他除了會變魔術戲法外，還有一個本領我很佩服，那就是他的化妝技巧非常高明。一個人經他稍許化妝，你就很難再認出來。我記得他曾用一種假牙往嘴上一套，人的模樣就全變了。」<sup>53</sup> 關於這一點，顧順章第二任妻子張永琴也曾描述：「有時外出，他就要化妝，戴一副眼鏡，在門牙上套上一副假牙，整個臉型就變了。」<sup>54</sup>

憑藉著這樣的本領，顧順章頓時成為「中統」與「軍統」炙手可熱的人物。在「轉變」初期，「戴笠（1897-1946）常常偷偷摸摸去找他，後來戴笠請求老蔣條諭中統負責人，有一段時間由顧襄助軍統工作」。<sup>55</sup> 顧順章為「三民主義力行社」（軍統前身「特務處」的上級機構，簡稱力行社）訓練處便衣隊的新進隊員講述偵探技巧，這讓日後「軍統」工作得到極大的成長。<sup>56</sup>

「中統」成立時間要早於「軍統」，但在後來卻漸漸被「軍統」迎頭趕上。

<sup>51</sup> 「中共特務部部長顧順章之自首及其與中共之打擊」，中央調查統計局編，《有關顧順章等破案經過》，檔號：276/7435/59400；徐恩曾，《我和共黨鬭爭底回憶》，頁20。

<sup>52</sup> 黃凱，〈我的特工生涯和所見所聞〉，《江蘇文史資料》，第45輯（1991年9月），頁6。

<sup>53</sup> 林金生，〈顧順章被殺真相〉，《江蘇文史資料》，第45輯（1991年9月），頁63。

<sup>54</sup> 孫曙，〈顧順章後妻張永琴訪談錄〉，《文史精華》，第5期（2003年5月），頁25。

<sup>55</sup> 黃凱，〈我的特工生涯和所見所聞〉，《江蘇文史資料》，第45輯，頁6。

<sup>56</sup> 工農紅軍方面軍政治部印，〈洵口戰役俘擄敵軍藍衣社便衣隊之自供〉，《兵運材料》，第15期（1933年10月31日），無頁碼。

領導人戴笠從一開始被臨時交辦一兩件事，到後來逐漸形成一定規模，這就與徐恩曾主持的調查科，在職權上難免疊床架屋。為了整合情報部門，1932年，蔣中正成立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由陳立夫（1900-2001）任局長，下轄三處：一處由徐恩曾主持，負責中共黨政與社會活動之調查；二處由戴笠負責，主要任務針對中共軍事活動之情報；三處由丁默邨（1901-1947）主持，負責掌管總務事宜。新成立的單位屬於半公開性質，對外對內不行文，工作重點著重在一、二處，遇到需要協調之處，由局內舉行工作會報加以溝通，陳立夫將其稱為「調統會報」。<sup>57</sup>

但實際上戴笠僅向蔣中正直接負責。因此陳立夫「曾存有併吞戴笠領導的特務系統的企圖」，為此他去尋找蔣中正，但卻得到「如果戴笠有什麼不當的行為，你隨時可以向我報告」的回答。在無法一家獨大下，陳立夫只能向「中統」幹員們自嘲地說：「我們的工作，可謂之曰黨的耳目，你們看人身上耳與目都是成雙的。所以黨的耳目，亦不妨有兩個，互相查對，是有益無損的。」<sup>58</sup>

不過徐恩曾與戴笠兩人彼此不合，「中統」與「軍統」又有競爭關係。加上徐恩曾對下屬相當嚴苛，「既要馬兒好，又要馬兒不吃草，表面上很關心，很拉攏，事實上是殘酷無情地耗盡下屬精神體力，毫不顧及他們健康。」這就與戴笠為人海派大方形成強烈對比。<sup>59</sup> 顧順章出身於上海青幫，而戴笠這樣性格就與顧順章很對口味。再者，顧順章曾撰寫一本《特務工作之理論與實際》，「經戴笠處長看見，如獲至寶，甚表讚揚，向顧購買一千冊，使顧名利雙收，喜不自勝。」<sup>60</sup> 因此經顧順章辦理的案子，就有「大案歸軍統，小案歸中統」的說法。<sup>61</sup>

<sup>57</sup> 陳立夫，《成敗之鑑：陳立夫回憶錄》（臺北：正中書局，1994年），頁106-107；王思誠，《瞻園憶舊》（臺北：展望與探索雜誌社，2003年），頁36-37。

<sup>58</sup> 陳立夫著，張緒心、馬若孟編述，卜大中譯，《撥雲霧而見青天：陳立夫英文回憶錄》（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2005年），頁135；張國棟原作，〈細說中統局（上）〉，《傳記文學》，第55卷第2期（1989年8月），頁73。

<sup>59</sup> 祝韻雅，〈中統頭目徐恩曾〉，《文史資料選輯》，第11輯（1987年7月），頁162-163。

<sup>60</sup> 王思誠，《瞻園憶舊》，頁34。

<sup>61</sup> 黃凱，〈我的特工生涯和所見所聞〉，《江蘇文史資料》，第45輯，頁6。

### 叁、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的初創與完善

特務，本指特別任務。今多半比喻受過特殊訓練，擔任特種工作的人。在中國，特務工作歷史由來已久。以明朝來說，在朱元璋（1328-1398）廢止宰相那一刻起，便注定這個王朝的與眾不同。丁易（1913-1954）在他的代表作《明代特務政治》一書中，以明代政治的特殊性，來反諷「蔣幫特務的鎮壓、逮捕、屠殺」。誠如書中開頭所言：「這本書是1945年春天動手寫的，1948年寫成，經過整整四年時間。」<sup>62</sup> 也就是說《明代特務政治》成稿的時代背景，是一個國共相爭天下的年代。但從這樣的表述，也不難看出特務工作是民國史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國民黨維繫政權的依託之一。

1923年8月，蔣中正代表孫中山（1866-1925）訪問蘇聯時，得到了這樣的感想：「布爾什維克黨組織之嚴密，紅軍軍事之健全，固為成功的主要原因，但是其情報工作的完善，因此發揮特殊的能力，實為其成功最重要的條件。」中國自晚清以來面臨種種民族恥辱，國家存亡命懸一線，這讓蔣中正意識到「情報工作便是我們目前救亡圖存的一種必要的武器！」情報工作在國民政府主政時期，「由政治的附庸地位，而成為整個的革命工作中的主要部份，尤其為政治鬥爭中的主要武器。」蔣中正認為：「要建立中國的革命基礎，又必以建立完善的情報事業為前提。」<sup>63</sup>

1927年蔣中正清黨後，便指示陳立夫成立調查科，「其主要任務對付共產黨的活動而制裁之」，也就是說國民黨特務最初成立的動機，是為了應對來自中共的挑戰。當陳立夫接到命令時，「感到我的個性對此頗不適宜，並且對這項工作絲毫沒有知識和經驗」，據他回憶稱：「我所知道的人，多半是美國留學生，學工程與自然科學或社會科學的，所以調查科開始組織，就是請這些人幫忙參加。」<sup>64</sup> 陳立夫當初在美國是主修採礦工程，所延攬的人有「徐恩曾、吳大鈞、趙隸華和楊丹英。還有在哈爾濱工學院研究俄文的張冲（1904-1941）、在

<sup>62</sup> 丁易，《明代特務政治》（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頁1。

<sup>63</sup> 蔣中正，《情報工作與完成革命事業的關係》（訓詞，1933年4月24日），法務部調查局藏，檔號：276.1/599/8264，頁5、7、10、12。

<sup>64</sup> 陳立夫，《成敗之鑑：陳立夫回憶錄》，頁105。

德國留學的卜孟秋。他們各有專精：楊丹英學政治，趙隸華學經濟，吳大鈞學統計」。這些人有一個共同的特點，「他們的家庭背景好、教養好，都是很有修養的人。不過都沒有受過諜報和調查訓練」。陳立夫所找的對象基本上都是與他有淵源的人，或者是透過別人所介紹。一開始調查科分為兩組：調查組由徐恩曾主持，楊丹英副之；統計組由趙隸華主持，吳大鈞副之。「開始時，每組有六、七人，兩組合計不超過二十人」。調查科便是這樣一步步學習摸索而逐步發展。這也讓陳立夫後來自豪地稱：「在我的主持下，這個科成為我國用科學方法和組織技巧來調查共黨活動的先驅。」<sup>65</sup>

除了對外公開的安全機構外，調查科另外成立一個秘密單位，裡面的工作人員完全是私密的，既不在編制內，也不在中央黨部辦公，而是在南京一棟半中半西式的二層樓內。為掩人耳目，便在大門外掛了一塊「正元實業社」的招牌。<sup>66</sup>徐恩曾本人是這樣形容「中統」的發展歷程：

革命力量雖已統一全國，開始訓政建設，然反動餘孽仍環伺在側，不時蠢動，故吾人之主要任務在消滅反動，保衛政權。此時之任務單純，目標顯著，人員與經費雖少，但組織嚴密，行動敏捷，意志集中，步調齊一，各地同志對工作經驗雖少，但兢兢業業，刻苦努力，虛心學習，冒險進取之精神則甚充沛，故其成就輝煌，至今若干同志回首前塵，當有不勝嚮往者。<sup>67</sup>

「消滅反動」與「保衛政權」是調查科成立之初兩大核心目的，共產黨是國民黨眼中的「反動」與威脅政權的存在，如何與之鬥爭就成為一個重要的議題。但調查科大多是「半路出家」，很難與訓練有素的中共特科相較。不過一切情況在中共特科領導人顧順章的「轉變」後有了不一樣的發展。

調查科在顧順章加入後，得到了質與量的大幅度成長。徐恩曾對此提到：「共黨的地下組織，封閉得很嚴密，在我擔任這個工作最初一年之間，從各方面

<sup>65</sup> 陳立夫著，張緒心、馬若孟編述，卜大中譯，《撥雲霧而見青天：陳立夫英文回憶錄》，頁133-134。

<sup>66</sup> 張國棟，〈細說中統局（上）〉，《傳記文學》，第55卷第2期，頁70。

<sup>67</sup> 徐恩曾，《徐局長告全體同志書》，法務部調查局藏，檔號：276/323/8269，頁2-3。

探索，始終找不到門徑。直到年度終了，忽然來了一個機會，使我能從此敲開了共黨地下組織的大門。」<sup>68</sup> 顧順章正是打開這扇神秘大門的鑰匙，一塊關鍵性的敲門磚。在「中統」發展史上，是這樣記述此次事件的：

中國國民黨於一九二七年（即民國十六年）四月清黨以後，首先肅清潛伏在黨內的共黨分子並對跨黨及共黨同路人加以整肅，同時展開對各地共黨武裝暴動以軍事力量清剿，對共黨的地下組織由黨政方面密切配合運用特務工作，予以破獲，數年之間頗收成效，尤以自一九三〇年起，國民黨中央發動號召共黨自首政策以後，收效尤宏，第二年的春天，這個在清共史最有名的顧順章事件便在反共工作收了絕大的果實。<sup>69</sup>

為了妥善利用這顆巨大的「果實」，顧順章由徐恩曾與總幹事張冲親自領導。徐恩曾與張冲分別為調查科第一與第二把手，這凸顯了顧順章的重要性。顧順章也不負所望，先是供出楊登瀛（1893-1969）、錢壯飛等一批潛伏在調查科內部的共產黨員，後又因為他的指認，使得人在蘇州監獄化名王作霖的中共領導人惲代英（1895-1931）隨即遭到國民政府處決。<sup>70</sup> 這樣的「投名狀」讓調查科相當滿意，顧順章在往後的日子裡，「獻策如何摧毀共黨在政府統治區內黨與群眾的組織」，「主要是個別召集各省市區的負責同志，分批到京，針對各地情況，由他面授機宜」。<sup>71</sup> 關於顧順章對調查科的貢獻有這樣的描述：

在顧順章轉變初期，我們全國各地的工作成果，尤其是京、滬、杭、蘇、武漢、北平等大城市的破獲，都與顧順章取得聯繫，每一案內的嫌犯俱有照片，送到顧處加以研究，在此數年中因他個人的關係，發現了許多重大案子，往往一個小案子，平時是證據不足，租界當局須把人犯釋放的，因為顧順章認出了其中一個化名分子原來是共黨老幹部，於是全部案件便變了性質，因此逐步佈置破壞致使共黨中央遭受

<sup>68</sup> 徐恩曾，《我和共黨鬭爭底回憶》，頁18；U. T. Hsu（徐恩曾），*The Invisible Conflict* (Hong Kong: China Viewpoints, 1958), p. 84.

<sup>69</sup> 「中共特務部部長顧順章之自首及其與中共之打擊」，中央調查統計局編，《有關顧順章等破案經過》，檔號：276/7435/59400。

<sup>70</sup> 黃凱，〈我的特工生涯和所見所聞〉，《江蘇文史資料》，第45輯，頁5-6。

<sup>71</sup> 王思誠，《曠世風雷一夢痕一九十年人生經歷見證》（臺北：立華出版公司，1995年），頁101。

不可補償的損失。<sup>72</sup>

鑑於顧順章在共產黨中的地位與經驗，徐恩曾要求他將中共黨員及其組織活動的特性，和各種方法編撰成冊，以作為教材使用。<sup>73</sup> 1933年7月，顧順章在南京完成《特務工作之理論與實際》一書，此書日後成為國民黨無論「中統」亦或者是「軍統」的重要教材。在書中自序裡，顧順章這樣提到：「這本書的內容，完全是根據我個人從各種不同的社會裡親身閱歷出來的實際經驗，既非抄襲其他著作，亦非得自異人傳授。偉大的社會是我的學校，艱難困苦的環境是我的導師，各種實際問題是我的書本和實驗的材料。」<sup>74</sup>

顧順章成為調查科新進人員的導師，由他負責的培訓班教育出一批又一批的中堅骨幹。課程主要講述共產黨員的意識形態、生活特徵，如何過組織生活，如何接近群眾，如何發展黨和群眾組織，如何佈置機關，如何隱匿自己身分，如何領導鬥爭，以及共產黨如何對國民黨軍政部門進行秘密滲透與分化的做法。在反滲透問題上，國民黨根據顧順章的建議，「先在各種機關團體部門，普遍建立足夠運用之秘密工作人員，而名之為『工作細胞』（俗名眼線）。完全義務性質，遇有成績表現時，即予獎償〔賞〕，藉此激勵」。<sup>75</sup>

在如何對中共進行組織破壞上，顧順章則提供幾項建議：「一、從外打入；二、從內爭取；三、政治說服；四、偵破控制。」首先培養一批人員，打入共產黨內部，「致使中共的一呼一吸，都在我秘密政治作戰部隊的掌握之中」；第二，透過這些打入的人員，從中共內部進行分化，曉之大義，或根據個別需求給予相對應之利益，使其「自首自新」；第三，將被捕共產黨員進行反省教育，願意「轉變」者給予政治與安全保障，反之則送入反省院，如此不僅能體現國民政府的「寬容政策」，又能進一步取得中共黨內情報；第四，系統地對共產黨進行組織偵查，把握一切蛛絲馬跡，以欲擒故縱模式，順藤摸瓜，由個別擊破到全面

<sup>72</sup> 「中共特務部部長顧順章之自首及其與中共之打擊」，中央調查統計局編，《有關顧順章等破案經過》，檔號：276/7435/59400。

<sup>73</sup> 王思誠，《曠世風雷—夢痕—九十年人生經歷見證》，頁101。

<sup>74</sup> 顧順章，《特務工作之理論與實際》（1933年7月20日），檔號：257.3/692/087044，頁1。

<sup>75</sup> 王思誠，《曠世風雷—夢痕—九十年人生經歷見證》，頁118。

破獲。<sup>76</sup> 顧順章這些建言經徐恩曾採用，成為調查科乃至於國民黨對付共產黨的重要準則。使得「中統」在早期與中共的鬥爭中，取得極大的戰果，同時奠定了國民黨特務發展的基礎，一定程度上填補了空白。

國民黨在特務工作上日漸成熟，組織架構也逐步完善。而中共在六屆四中全會後黨內發生路線衝突，許多黨員在不滿留蘇學生主政下，紛紛出走或是被捕「叛變」。為了趁勢打擊中共的發展，調查科勢必得對原有組織再進行加強與調整，「特工總部」就此孕育而生。「這個新設置的秘密辦公機關，不掛招牌，不設武裝門警，終日大門深鎖，憑特製證章進出，對外沒有任何正式名稱，對內稱為道署街辦公室，一般習稱為特工總部，因具秘密性質，亦有人稱為隱形特工總部」。特工總部在工作上逐漸取代正元實業社，組成人員以中央黨校與中央軍校學生為主，總人數達百人以上，同時有不少人是中共「轉變」過來的「自首自新」人員。<sup>77</sup>

特工總部成立後，即在各省市、各黨部內成立特務室，在上海、南京設立秘密的行動區。特工總部不存在於國民政府亦或者國民黨的組織條例中，對外活動皆以化名或是代號，各地下屬組織也都有專屬代號。總部內所屬幹員在公開場合稱徐恩曾為「徐先生」，私底下則稱他為「徐老闆」或是「老闆」。由於特工總部沒有固定編制，因此在操作上就顯得相當靈活，「工作人員名單，只是用來向上級領取工資，所以甚至有些人連自己在哪個處裡、擔任什麼職務、多少薪金也不知道，而且從不過問，也是不容過問的」。<sup>78</sup>

為了鞏固組織，為了強化每位幹員的政治思想，為了培養集體意識，「中統」內部有不少制度是沿襲中共傳統，小組生活即是一個例子。徐恩曾發展出一套群眾性組織，稱「聯益會」。凡是「中統」工作人員，均須入會為會員。每月薪水5%為會費，作為活動基金，徐恩曾則有這筆款項的最終決策權。「聯益會」在會章第一條便是「只有信仰三民主義，中國方有出路」，幹員們必須研讀馬列書籍，學習共產黨思想，並在每週小組會議上進行報告。小組中最高為「核

<sup>76</sup> 王思誠，《瞻園憶舊》，頁32-33；王思誠，《曠世風雷一夢痕—九十年人生經歷見證》，頁119-120。

<sup>77</sup> 王思誠，《瞻園憶舊》，頁37。

<sup>78</sup> 張國棟，〈細說中統局（上）〉，《傳記文學》，第55卷第2期，頁72-73。

心小組」，由「中統」領導人任組長，組員為各單位負責人。開會時每人必須反省一週以來的思想言行，有無違背「中統」信條，接著進行自我批評和互相批評。倘若隱瞞或是欺騙而遭人揭發，則會受到組織懲處。<sup>79</sup>

調查科在徐恩曾領導之下組織逐漸完備，尤其是顧順章「轉變」後，使得國民黨在與共產黨鬥爭中站到有利的高度。據調查科統計資料顯示，自1930年夏至1933年間，「先後破獲共匪重要組織兩百餘起」。這些案件主要是在六屆四中全會後破獲，加上國民黨透過被捕共產黨人或是「轉變」分子瞭解到中共黨內問題，利用他們來打擊共產黨，如顧順章、向忠發、余飛、徐錫根等人。相信沒有比共產黨員更能熟悉共產黨。加上蔣中正在1931年開始，調動幾十萬國軍對蘇區展開圍剿。在內外夾攻之下，中共革命遇到相當大的瓶頸。「共匪內部重要分子大量一批一批的覺悟，自首自新，使共匪在我區之秘密組織大呈瓦解之現象」。<sup>80</sup>

不過隨著中共改變策略，在地下組織架構上進行了人員的調整。在周恩來的領導之下，將原先與顧順章相關的人事物進行轉移，這導致後期「中統」在與中共鬥爭上不再具有相對優勢。正因如此，顧順章利用價值逐漸降低，「死不足惜」成為他日後被殺的遠因之一。

## 肆、中共黨人的「自首自新」

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後，由於領導層在革命路線上的分歧，導致中、下層黨員無所適從。面對這樣的現象，共產國際遠東局在給莫斯科的報告中提到：「四中全會後我們有很多人被捕。光上海一地我們就平均每天損失三人。」<sup>81</sup> 其中顧順章的「叛變」加速了這個現象。在他「叛變」前，「有一個組織得很好的在黨內

<sup>79</sup> 萬亞剛，《國共鬥爭的見聞》，頁305-306。

<sup>80</sup> 「破獲中共中央政治局案之經驗簡述」，中央調查統計局編，《有關顧順章等破案經過》，檔號：276/7435/59400。

<sup>81</sup> 「破獲中共中央政治局案之經驗簡述」，中央調查統計局編，《有關顧順章等破案經過》，檔號：276/7435/59400。

反對間諜和奸細並在敵人的組織和軍隊中進行破壞工作的機構」。這個機構是為中共特科，由顧順章負責實際工作。中共特科主要任務是「把注意力集中在揭發奸細和『積極』與之作鬥爭上」。但諷刺的是本是保護黨安全的組織，身為領導人的顧順章卻成為「叛徒」，而給共黨帶來巨大的危害。對此，共產國際對中共中央提出警告：「該部工作中的主要缺點是把全部工作過分地集中在一個人身上，當顧在武漢被捕並供出他所知道的共產黨的工作內容和工作方法時，其危害性就暴露出來了。」<sup>82</sup>

調查科也因為陸續有中共黨人的變節，在上海和南京等地成立特別小組，由中共「轉變」分子如顧順章、楊虎（1889-1966）、馮菊坡（1899-1957）等人，傳授與共產黨鬥爭的方法。共產國際批評中共中央：「儘管遇到異乎尋常的恐怖，儘管有成千上萬的共產黨人被殺害，黨仍處在半地下狀態，沒有給予應有的注意來從組織上鞏固地下機關。」在周恩來及時的應變之下，雖沒有因為顧順章「叛變」帶來更大的危害，但是「黨沒有動員起來同保密工作的具體破壞者及奸細活動的幫兇作鬥爭」。<sup>83</sup> 因此，共產國際得出這樣的總結：

中國共產黨工作中最大的弱點是，地下機關工作的組織方式考慮欠周，有時對技術和聯絡性工作漫不經心。過於集中，一個人知道很多人的地址，同許多人進行聯繫；在合法和半合法組織裡公開積極工作的人，同時又主管地下機關，甚至掌管技術和聯絡性工作；集中在一個或幾個工作人員周圍的機關臃腫而龐大；漫不經心地挑選技術人員和聯絡人員——所有這一切乃是遭致許多暴露和不必要犧牲的原因。<sup>84</sup>

<sup>82</sup>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特工部關於遠東和近東國家共產黨秘密工作狀況和特務工作情況的書面報告」（1932年6月3日），收入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譯，《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1931-1937》，第13卷（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年），頁160-161。

<sup>83</sup>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書記處關於保密工作給中共中央的信」（1932年4月16日），收入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譯，《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1931-1937》，第13卷，頁139-140。

<sup>84</sup>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書記處關於保密工作給中共中央的信」（1932年4月16日），收入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譯，《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1931-1937》，第13卷，頁141。

但總歸而論，早在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前後，黨內就已遭到滲透。舉例來說，中共江蘇省委在1931年1月23日通過《江蘇省委關於四中全會的決議》的翻印文件，調查科隨即在「中華民國廿年參月廿四日收到」。<sup>85</sup> 又，中共上海市閘北區委書記王鳳飛呈中共中央《反四中全會的意見書》翻印件，調查科也在「中華民國廿年五月壹號收到」。<sup>86</sup> 顧順章是在1931年4月下旬被捕，而這兩份文件一份是在他被捕前收到，一份在之後。可見調查科在對付共產黨上有一定的基礎，只是在顧順章「轉變」後才有跳躍性的成長。不過這也表示此時中共內部早已存在的安全隱患。

## 一、「自首自新」政策

根據調查科編撰的《轉變》一書來看，這些「轉變」分子中，上有中共中央總書記向忠發、政治局委員徐錫根與盧福坦（1890-1969）、政治局候補委員顧順章、中央委員余飛等中央領導層級。下至一般基礎黨員、共青團團員。<sup>87</sup> 調查科透過這些「轉變」分子的自白或宣言，對仍潛伏的共產黨員作一政治宣示，藉此強調國民政府的「寬大為懷」。在顧順章的建議之下，國民政府健全了「自首自新」政策，而這成為國民黨用來對付中共的一項利器。關於這項政策，調查科是這樣描述的：「本『三分軍事七分政治』之原則，著重以黨的力量，打擊共黨的組織，對共黨份子，注重自新政策的號召，結果共黨機關紛紛破獲，共黨份子大批自首，增強本黨反共力量，予共黨以實質精神的大打擊。」<sup>88</sup> 「自首自新」政策的內涵是「重用叛徒，擴大自首潮流，以毒攻毒」，這樣的策略給中共帶來不小衝擊。<sup>89</sup> 調查科利用「滲透與招撫」，「不採取殺戮，使共黨自首自新，而以思想之改造，其有能力者並予錄用。故來歸者甚為踴躍，清黨後十

<sup>85</sup> C. Y. 江蘇省委，《江蘇省委關於四中全會的決議》（1931年1月23日），法務部調查局藏，檔號：255.31/806/12470。

<sup>86</sup> 王鳳飛，《王鳳飛反四中全會的意見》（1931年1月26日），法務部調查局藏，檔號：262.3/23/14902。

<sup>87</sup> 中央組織部調查科編，《轉變》（1933年12月），檔號：245.3/841/14824。

<sup>88</sup> 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編，《兩年來之中國共產黨（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三）》（1933年7月），法務部調查局藏，檔號：270.01/7455 c.3/09749，頁208。

<sup>89</sup> 張國棟，〈細說中統局（上）〉，《傳記文學》，第55卷第2期，頁71。

年之間為數達兩萬人」。<sup>90</sup>

自1931年至1933年兩年間，據調查科統計：「各地破獲之比較以江蘇、河北、山東、安徽，成績為最佳，尤以上海為最，河北次之，湖北又次之。其原因由於前兩年武漢共黨遭受嚴重破獲，不能建立；同時共黨以城市不能活動，轉移注意力於洪湖及鄂東等匪區之發展，無可破獲之對象也。」<sup>91</sup> 1932年12月，共產國際遠東局對此也無奈表示：「最近兩個月來，大約進行了200次逮捕，被捕者中有一些是省（黨）委負責人。」<sup>92</sup> 這些被捕的共產黨員，依照其在中共黨內地位，給予分別處理。調查科對這些人，「詳詢其加入共黨之動機及對於中國政治情形的認識，繼解釋其錯誤之所在，與指示應循之革命途徑，而勸其轉變，為實行三民主義而努力。」三民主義是國民黨的意識形態，調查科宣稱：「本黨主張的正確，政治問題的解釋，及其對監獄的優待，人非石木，能不轉變！」在「反省教育」下，除了「執迷不悟者予以制裁」，其餘「誠懇悔悟者准其自新」，一些「有可能悔悟而須要訓導者送反省院」。<sup>93</sup>

反省院是國民黨執行「自首自新」政策的一個重要機構。「反省院之設立，在感化一般受共產黨麻醉之份子，使其由歧途而歸於正道」。<sup>94</sup> 反省院成立之初隸屬於司法系統，與一般監獄並無二異。反省院院長由各省高等法院院長兼任，「法院院長在法律上雖不失為專家，但對共黨理論及組織內容，多欠明瞭，對教育反省人，又多固執，視同普通囚犯。故雖有反省院之設立，迄未收反省實際之宏效」。調查科在徐恩曾上臺後，便希望透過「反省教育」來對付這些被捕的中共黨人。在他的建議之下，各地的反省院院長，陸續改由特工總部派員擔任。使

<sup>90</sup> 「陳立夫參加抗戰準備工作之回憶」（1977年7月29日），〈任總統時：函（六十六年）（一）〉，《嚴家淦總統文物》，典藏號：006-010806-00006-012。

<sup>91</sup> 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編，《兩年來之中國共產黨（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三）》（1933年7月），檔號：270.01/7455 c.3/09749，頁209。

<sup>92</sup> 「埃韋特給皮亞特尼茨的第2號報告」（1932年12月初），收入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譯，《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1931-1937》，第13卷，頁258。

<sup>93</sup> 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編，《兩年來之中國共產黨（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三）》（1933年7月），檔號：270.01/7455 c.3/09749，頁209-210。

<sup>94</sup> 安徽反省院編，《安徽反省院概覽》（安慶：編者出版，1935年），頁1。

得反省院逐漸成為「中統」下屬的一個機構。<sup>95</sup>

反省院設立的宗旨是「感化反革命人」，那麼為了感化這些「反革命人」，訓育人員「除具有訓育學識經驗外，尚應深切認識黨義，忠實為黨服務，並具有摘奸發伏之能力」。<sup>96</sup>「反省人」經評判委員會鑑定後，無需繼續「反省」者可由反省院發自新證書予以出院。<sup>97</sup>雖說出院，反省院仍下令「反省人」所屬籍貫黨部「嚴密注意其思想言動，並設法訓誨，俾收感化實效」。<sup>98</sup>

出院的「反省人」須接受管制三年，「中統特務經常派人秘密監視這些人，如認為某人有嫌疑時，隨時可以將其重新關押監禁。如果未經中統特務許可，自由離開原規定地區者，要受到嚴厲的處罰；如果此人找不回來，那麼他（她）的家屬便會被牽連，甚至被關押起來」。<sup>99</sup>也就是說，「反省人」即使獲得出院資格依然不被國民黨所信賴。

在三民主義的指引之下，進入反省院的受刑人大致可以分為四類：「一、被認為轉變不澈底份子；二、堅決不承認自己是共產黨員的人；三、被認為有共產黨嫌疑的人和思想左傾人士；四、原屬中統後被認為對黨對組織不忠誠、違反紀律的人。」<sup>100</sup>「反省教育」的功能就是將這些人引導回革命的「正途」，三民主義似乎成為了解藥良方，能給這些「迷途羔羊」一盞光明指示。尤其是這些「反省」的中共黨人，「大多數是因為個人環境的逼迫，對政治現狀的不滿，經濟的

<sup>95</sup> 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編，《兩年來之中國共產黨（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三）》（1933年7月），檔號：270.01/7455 c.3/09749，頁212-213；張國棟，〈細說中統局（上）〉，《傳記文學》，第55卷第2期，頁72-76。

<sup>96</sup> 「反省院訓育工作應以深切認識黨義忠實為黨服務之黨員充任令」（1931年11月11日），收入立法院編譯處編，《中華民國法規彙編》，第11-12編（南京：中華書局，1934年），頁103。

<sup>97</sup> 「反省期間應從實施訓育之日起算期滿無須繼續反省者即由反省院發給自新證書令」（1931年10月14日），收入立法院編譯處編，《中華民國法規彙編》，第11-12編，頁103-104。

<sup>98</sup> 「反省院出院應將履歷等件通知省市黨部轉飭反省人原籍黨部注意其思想言動令」（1931年7月27日），收入立法院編譯處編，《中華民國法規彙編》，第11-12編，頁104。

<sup>99</sup> 張國棟，〈細說中統局（上）〉，《傳記文學》，第55卷第2期，頁72-77。

<sup>100</sup> 張國棟，〈細說中統局（上）〉，《傳記文學》，第55卷第2期，頁72-77。

困難，感情的衝動，直接間接被共黨煽惑而入其圈者」。<sup>101</sup> 日後隨著顧順章被槍斃，他的妻子張永琴也被抓進了反省院。基本上文化程度越低，表示反省人在思想上相對單純，這也就是為什麼這些人比較容易被釋放。張永琴是中學畢業，但因為她是顧順章遺孀，不同於一般「反省人」，故而受到相對艱苦的待遇。最終在張冲的協助下，張永琴才順利出院。<sup>102</sup>

至於這些加入共產黨的人，是否真的是受到馬克思主義的感召，進而參與革命？是否為了廣大的無產階級而奮鬥呢？根據1930年代統計資料顯示，當時中國資產階級、富農階級與中農階級人口僅占全國人數32%，但卻擁有可耕種土地的78%。底層貧農階級占全國人口68%，但僅擁有22%的土地。<sup>103</sup> 也就是說中上層階級的人擁有土地平均是底層的7.5倍。土地資源被少數人控制，導致農村經濟的破產。中共利用土地重新分配的方式，吸引不少貧苦農民的加入。一些人因為飢餓而加入紅軍，因為紅軍會給他們吃的，有些人則覺得加入紅軍「很時髦」。<sup>104</sup> 關於這一點，如表1、表2所示：

表1、共產黨及其群眾組織團工會的組織對比表

時間	1931年3月			1933年7月		
類別	黨員	團員	工會會員	黨員	團員	工會會員
地區						
蘇區	50,000	40,000	100,000	100,000	90,000	160,000
非蘇區	18,050	9,580	50,000	9,330	6,510	40,000
全國	68,050	49,580	150,000	109,330	96,510	200,000

資料來源：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編，《兩年來之中國共產黨（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三）》（1933年7月），檔號：270.01/7455 c.3/09749，頁40-41。

<sup>101</sup> 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編，《兩年來之中國共產黨（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三）》（1933年7月），檔號：270.01/7455 c.3/09749，頁210。

<sup>102</sup> 孫曙，〈顧順章後妻張永琴訪談錄〉，《文史精華》，第5期，頁28。

<sup>103</sup> Joseph W. Esherick（周錫瑞），“Number Games: A Note on Land Distribution in Prerevolutionary China,” *Modern China*, 7: 4 (Oct. 1981), pp. 390-391.

<sup>104</sup> 周錫瑞（Joseph W. Esherick），〈關於中國革命的十個問題〉，收入董玥主編，《走出區域研究：西方中國近代史論集粹》（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頁200。

表2、中共黨員和團員階級成份表

黨團 \ 成分	工人	農民	士兵	知識分子
黨員	5.8%	87%	3%	4.2%
團員	5%	70%	10%	15%

資料來源：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編，《兩年來之中國共產黨（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三）》（1933年7月），檔號：270.01/7455 c.3/09749，頁42。

中共在蘇區無論是黨員或團員、工會會員，人數皆有大幅度增長；非蘇區則反之。蘇維埃根據地多半是在各省交界處，這些地方是國民黨勢力較難深入的。過去比較不受重視的農民，反倒成為中共革命的中堅力量。共產國際就曾指示：「必須把60%的黨務人才統統〔通通〕派到蘇區和紅軍中去」。<sup>105</sup> 這些統計資料雖是出自調查科，數據上可能略有出入，但也顯示國民黨對中共階級結構有一定的認識。許多農民是因生活所迫而加入共產黨，相信不少人根本不清楚何謂「蘇維埃」、何謂「布爾什維克」，對付這樣的人只要確保他們有一定的生存保障便可分而化之。這也可以解釋為何這段時期會有這麼多中共黨人「自首自新」。

## 二、中共的反擊

面對調查科的來勢洶洶，為了應對這股「自首自新」的「轉變」風潮，周恩來強化了黨的保密工作，完善黨的技術路線，讓各機構職權有明確劃分。首先周恩來在獲悉顧順章「叛變」後，立即採取以下緊急措施：1、銷毀大量機密文件，將黨的主要負責人迅速轉移，並採取嚴密的保衛措施；2、將一切可以成為顧順章偵查目標的幹部，迅速轉移到安全的地區或調離上海；3、切斷顧順章在上海所能利用的關係；4、廢止顧順章所知道的一切秘密工作方法。<sup>106</sup> 此外，在有「黨的保險箱」之稱的中共特科上，1931年6月周恩來將其改組為「中央特別工作委員會」，由周恩來、康生、陳雲（1905-1995）、潘漢年（1906-1977）、

<sup>105</sup> 楊奎松，《“中間地帶”的革命—國際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頁251。

<sup>106</sup>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周恩來年譜（1898-1949）》，頁207。

鄭惠安（1903-1935）任委員。<sup>107</sup>「這些領導人彼此不知道。每科都有獨立的機關、住處和接頭地點。這些科的機關大大縮減了。中央書記處機關和上海省委機關和工會機關以及某些省組織也大致同時進行了改組」。<sup>108</sup>

據調查科的報告，中共中央為遏止其持續進攻，採取以下措施：

匪中央一面從匪區大量調出，射擊精良的軍事幹部，重整其在滬之暗殺組織，加強其內部控制及對政府反共組織與轉變到政府的有力份子的報復。一面決定實施其精簡隱蔽之組織政策，凡暴露或與業已轉變到政府方面的人有熟識者一律調回匪區，並堅決的執行審幹政策，凡經認為稍有不穩者，常施以殘酷的殺害，或用其可恥的告密手段，對於新的分子的吸收，極其謹慎，其組織技術，確已做到極端隱蔽的要求，同時更大施其恐怖手段。<sup>109</sup>

為了殺雞儆猴，為了鎮懾調查科，同時也為了告訴黨內同志與共產黨為敵的下場。周恩來除了在第一時間「鎮壓」顧順章家屬外，在他指示之下中共特科迅速重整，開始對國民黨展開反擊。這或許也能解釋為何在中共「轉變」分子的自白或宣言中，很少有對周恩來的攻擊或批評，畢竟顧順章家屬的下場殷鑑不遠。

1932年10月25日，由鄭惠安率領紅隊衝入調查科上海區閘北分區主任曹伯謙住所槍殺多人後離去。1933年4月21日下午，中共「轉變」分子雷達夫、胡均鶴（1907-1993）等人在上海市區與紅隊發生槍戰，雷達夫當場殞命。調查科謂「在此案發生之前，本局派在警備司令部工作之王斌同志，被匪潘漢年主持擊斃於八仙橋，此一時期匪紅隊正向吾人採進攻狀態」。<sup>110</sup>

<sup>107</sup> 王健英編，《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匯編—領導機構沿革和成員名錄》，頁147。

<sup>108</sup>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特工部關於遠東和近東國家共產黨秘密工作狀況和特務工作情況的書面報告」（1932年6月3日），收入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譯，《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1931-1937》，第13卷，頁161。

<sup>109</sup> 「破獲中共中央政治局案之經驗簡述」，中央調查統計局編，《有關顧順章等破案經過》，檔號：276/7435/59400。

<sup>110</sup> 「消滅共匪紅隊案之經驗簡述」，中央調查統計局編，《有關顧順章等破案經過》，檔號：276/7435/59400。

1933年6月14日下午，調查科上海區負責人史濟美（1906-1933）<sup>111</sup>「被匪紅隊鄭惠安率領紅隊多人」殺害，「史同志被匪特務隊六個殘暴的兇手攻擊，身中七槍，殉職犧牲」。<sup>112</sup> 調查科面對史濟美的犧牲，「滬地同仁痛恨共匪暗殺之無恥，莫不誓復此仇，乃對共匪潛滬之秘密組織，大加搜索破獲，因之共匪對本局在滬之幹部更為仇恨」。<sup>113</sup> 史濟美的殉職引起國民黨高層重視，蔣中正對此指示：「准優卹並查明其家族加急撫慰。」<sup>114</sup>

8月12日，繼任史濟美職缺的錢義璋，「不幸被匪紅隊刺殺於雲南路大中華飯店三樓電梯傍，腰中左輪兩槍，當即殞命」。「不及兩個月中，本黨特工上海負責人連續被匪暗殺，一時暗殺氣氛極濃。再加上共匪秘密組織極端的講求隱蔽的技術，以致匪的秘密組織之線索，一時毫無可尋」。<sup>115</sup> 為了應對中共的挑戰，調查科在策略上作了一些部署，首先派人潛入中共特科，紅隊中的三十五名幹部有七名就是潛伏人員。其次，利用反間計配合上海公安局及淞滬警備司令部，偽造「共匪黃國華秘密辦理自首，秘密帶著治安人員，對匪中央進行跟蹤」的情報，來引誘紅隊上鉤。果然黃國華隨即在寓所內遭到紅隊狙擊，但無大礙，並被護送至上海公共租界仁濟醫院治療。<sup>116</sup>

1934年9月26日，「匪紅隊鄭惠安率領牟宗之、華圃等五人，攜帶德造快慢機可以連發二十響之盒子槍，分別混入仁濟醫院正樓的二樓，集中火力，竄入黃國華所住之病房，連發數槍，黃遂即畢命」。鄭惠安隨即逃亡，但落腳點遭到調

<sup>111</sup> 史濟美曾抓獲中共青年團中央書記王程雲、中央組織部長孫際明、中央宣傳部秘書于桂生、中央秘書陳卓文、中央交通科主任劉永清等三十餘名中共青年黨員，可謂戰功赫赫，因而受到國民黨高層的器重。「陳立夫電蔣中正」（1933年2月7日），〈種種不法罪行（一）〉，《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90300-00017-084。

<sup>112</sup> 「消滅共匪紅隊案之經驗簡述」，中央調查統計局編，《有關顧順章等破案經過》，檔號：276/7435/59400。

<sup>113</sup> 「史烈士濟美」，收入司法行政部調查局編，《本局歷年殉職殉難烈士事略》（臺北：編者自印，1957年），頁40。

<sup>114</sup> 「陳立夫電蔣中正」（1933年6月17日），〈一般資料—民國二十二年（二十八）〉，《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80200-00098-021。

<sup>115</sup> 「消滅共匪紅隊案之經驗簡述」、「破獲中共中央政治局案之經驗簡述」，中央調查統計局編，《有關顧順章等破案經過》，檔號：276/7435/59400。

<sup>116</sup> 「消滅共匪紅隊案之經驗簡述」，中央調查統計局編，《有關顧順章等破案經過》，檔號：276/7435/59400。

查科掌握。隔日，在內應的配合之下，鄭惠安被調查科逮捕。鄭惠安被引渡後，「要求准予悔悟，擬定肅清共匪殘餘計畫，經呈奉中央核定，解送中央訊辦，該案因責任重大，如輕易准予自新，則無以面對死難殉職的幹部同志，鄭惠安、牟宗之等五名處絞刑」。至此，上海的國共特務衝突才稍作趨緩。鄭惠安案後，「完成對犧牲於工作崗位上諸烈士之報仇雪恨，完成對匪紅隊之消滅」，但是調查科遺憾地表示：「潘漢年、趙雲〔按：康生〕兩匪首在匪中央政治局案破獲引渡後逃離上海，未能同案緝獲，否則當更增加此案之政治意義」。<sup>117</sup>

中共對「轉變」事件原先採取掩飾，再伺機暗殺叛徒，可在面對「……不斷逮捕和領導人叛變，形成令人壓抑的局面」。<sup>118</sup> 中共逐漸意識到，「利用黨內階級異己份子與叛徒，來進行對黨對革命的明攻暗襲，是目前反動統治進攻革命最毒辣的武器」。<sup>119</sup> 而其掩飾之舉也遭到共產國際的批評，「以往掩飾這類事件（叛變行為）的做法具有渙散人心的作用」。<sup>120</sup>

為反擊國民黨的「自首自新」策略，日後中共發展出一套黨員忠誠教育，提出：「黨應時刻教育每個黨員以堅決為黨為階級犧牲決心，動搖逃跑，自首自新是黨的污點，是最可恥的現象，我們堅決要消滅這一現象。」<sup>121</sup> 政治堅定是每一位共產黨員的基本要求，站在這個立場，就必須「以大無畏精神擁護黨確定黨『高於一切』為信念，澈底認識秘密工作之政治意義，才能保持秘密工作之執行」。秘密工作是無產階級「革命的戰術」和「策略的組織成份」，是無產階級「革命的組織屏圍」。<sup>122</sup> 誰忽視了秘密工作，「誰就是敵人的助

<sup>117</sup> 「消滅共匪紅隊案之經驗簡述」，中央調查統計局編，《有關顧順章等破案經過》，檔號：276/7435/59400。

<sup>118</sup> 「格伯特給皮亞特尼茨的信的摘錄」（1932年12月），收入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譯，《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1931-1937》，第13卷，頁289。

<sup>119</sup> 陳文，〈再論鞏固黨的組織的迫切任務〉，《紅旗半月刊》，第59期（1933年），頁46-47。

<sup>120</sup> 「埃韋特給皮亞特尼茨的第2號報告」（1932年12月初），收入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譯，《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1931-1937》，第13卷，頁263。

<sup>121</sup> 閩粵贛邊省委編（此標題為「中統」人員添加，應為「中共閩粵贛邊省委組織部」），《關於自首自新決定的通知》（1937年10月15日），法務部調查局藏，檔號：245.3/815/12626。

<sup>122</sup> 廣東省調查室編，《東江共黨密件（桂字第65號）》（1940年4月28日），法務部調查局藏，檔號：276/814/7337。

手」。<sup>123</sup> 所以周恩來要求每一位黨員，「要嚴格審查幹部，黨的領導機關所有的工作人員必須經過嚴格的審查，要防範於未然。發覺可疑的人，甚至是有點動搖猶豫的人知道領導機關所在地時，都必須毫不猶豫，立即轉移」。<sup>124</sup> 周恩來也曾強調共產黨人必須「要有為革命獻身的決心和勇氣」。<sup>125</sup>

## 伍、顧順章結局

說也諷刺，「自首自新」政策是在顧順章獻策下得以逐漸完善，但他本人最終卻也被關進反省院。首先顧順章是中共「叛徒」，他深深明白背叛組織的下場，所以在變節的第一時間即要求調查科拯救在上海的家人。中共特科有一項重要任務，「他們就是C. P. [按：中共]的保險箱，他們一方面要幫助消滅敵人，一方面還要清除自己團體內自首或告密的害群之馬。他們又幫助黨在組織上檢查不良分子，如果黨發生特殊困難時，也均由特務工作負責解決」。<sup>126</sup> 顧順章深怕家人被中共特科給「解決」，然「不幸顧案經過，被匪周恩來獲悉，致匪得以事先將顧妻張杏珠等誘至甘斯東路愛棠村十一號，秘密施以殺害，同罹難者顧之岳父母妻弟夫妻子女等八人，又顧之親信及師友五名亦被殺害」。<sup>127</sup> 調查科抓獲的一位共產黨員王竹友向顧順章表示懺悔：「請你原諒我，這不是我的罪惡，我是奉命執行的，在我們得到你『轉變』消息後，周恩來立即召見我，要我把你的家眷，統統〔通通〕解決。」據王竹友的自白供稱：「這些皆是叛逆分子，或者反對周恩來命令的共產黨員。皆是奉周的命令執行的，執行的人大多數不知姓名，便糊里糊塗把他們殺害了。」顧順章聞訊後，「慘然流涕」，「靜默者久之」，

<sup>123</sup> C. Y. 江蘇省委會編，《緊急通知—關於秘密工作》，法務部調查局藏，檔號：255.34/806/9270。

<sup>124</sup> 鄭伯克，《白區工作的回顧與探討：鄭伯克回憶錄》（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7年），頁145。

<sup>125</sup> 沈安娜，〈教導勉勵永記在心—憶周恩來指導我做情報工作〉，《黨的文獻》，第1期（1998年1月），頁42。

<sup>126</sup> 顧順章，《特務工作之理論與實際》（1933年7月20日），檔號：257.3/692/087044，頁187。

<sup>127</sup> 「消滅共匪紅隊案之經驗簡述」，中央調查統計局編，《有關顧順章等破案經過》，檔號：276/7435/59400。

「當時顧對其家屬之消息是很感痛苦的，這點似乎又可證明他對於個人的家庭觀念還是很濃厚的」。<sup>128</sup>

1931年11月29、30日，顧順章在《申報》接連兩天刊登出「顧順章懸賞殺人兇手周恩來等緊要啟事」，痛述共產黨對其家屬的迫害，讓他「痛不欲生」。顧順章自稱：「乃於本年四月自動脫離共黨，向黨國當局悔過自新；從此閉戶讀書，以求學術之長進，對於共黨任何人，從未加以陷害，蓋順章只有主義之鬥爭，並無個人仇恨之心裡，此亦政治家應有之態度！」顯然顧順章對自己的變節有其一套完美說詞，悲憤之餘他尚能利用自身不幸遭遇來反擊中共。在啟事裡顧順章將自己描述為一位受害者，而中共不僅殺妻屠族，還奪人錢財。據他稱：「順章岳母之私款七千餘元及價值三千餘元之田產單據，亦被劫奪以去。」<sup>129</sup>

社會上一般對弱者較為同情，因此顧順章此招手段可謂高明。這就讓中共不得不作出回應：「原來在他叛變之後，所以殘殺我們的同志，不是因為對共黨個人有什麼仇恨，而是因為他對於整個的共黨有莫大的仇恨。但是正因為如此，所以他變成了革命的叛徒，變成了國民黨的嗜血的惡狗，變成了高等的偵探員！」<sup>130</sup> 1931年12月10日，由毛澤東（1893-1976）署名發布了〈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通令一叛徒顧順章的懸賞啟事〉，內容這樣描述顧順章：「以殺人兇犯污我革命負責同志與中共中央，企圖用這一陰謀詭計破壞中共及其負責者在群眾中的信仰，更無恥的顧順章自己還登報通緝中共負責同志周恩來等，說他自己自從叛變後，並未陷害過共黨任何人」。對此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號召各地蘇區與民眾，「要一體嚴拿顧順章叛徒」，要將他「撲滅」。<sup>131</sup>

這樣的答覆似乎也沒有回應顧順章所控訴的「奪人錢財」，據悉中共中央派

<sup>128</sup> 「關於周恩來謀殺顧順章全家案始末」，中央調查統計局編，《有關顧順章等破案經過》，檔號：276/7435/59400；（國民黨）中央組織部特務組調查科編，《周恩來殘殺顧順章家屬及異己分子三十餘人埋藏上海租界區域之發現》，法務部調查局藏，檔號：276/7435b/19933。

<sup>129</sup> 顧順章，〈顧順章懸賞緝拿殺人兇手周恩來等緊要啟事〉，《申報》，上海，1931年11月30日，版2。

<sup>130</sup> 〈叛徒顧順章的懸賞啟事〉，《紅旗週報》，第26期（1931年12月），頁64。

<sup>131</sup> 〈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通令一叛徒顧順章的懸賞啟事〉，《紅旗週報》，第27期（1931年12月），頁94-95。

人「解決」顧順章家屬時，「在他們的住處，不僅搜出很多打（每打等於十二罐）價值很貴的（每罐合4-5元）雞汁、肉汁等罐頭和一大包鴉片煙土（顧等平時吸鴉片），而且搜出顧用黨的經費在上海郊區買地的地契。地契上寫著他岳父的姓名」。王明等人也批評顧順章，稱：「其為人流氓習氣很重，政治文化水平很低，立三中央對他和其他工人幹部一樣，不重視政治理論教育，大批黨的經費任他花費，不加檢查，因而他的思想、生活都早已腐化。」<sup>132</sup>

其次，顧順章是「轉變」分子，面對這種背離組織，手上沾滿過往同志鮮血的人，國民黨自然不敢完全信任。雖說顧順章有優秀的特務技巧與能力，但也正是因為他表現太過突出，這樣的人一旦駕馭不好難保不會反咬自己一口。再者，顧順章遊走在徐恩曾與戴笠之間，不懂得避嫌。顧順章曾對監視他的調查科幹員王思誠表示：「戴笠已決定邀請他到二處去工作，並邀請我與他同去。辦公桌子已經擺好，祇等通知送到，就可正式去上班。」顧順章過於天真，誠如王思誠的答覆：「戴笠所要做的工作，乃是恩曾先生正在進行中的工作，且已有成績表現，他怎肯輕易放你他就？」<sup>133</sup>

關於這一點徐恩曾是這樣回憶的：「由於他不安份的本性，我雖盡量優容他，款待他，使他在生活方面不感到欠缺，他不願像我們這樣做不求人知的工作。最初，他在我們這邊找出路，找不到，於是又偷偷摸摸去和共黨勾結。」<sup>134</sup>所謂的「找出路」，指的是顧順章希望投靠戴笠，這自然也觸怒了徐恩曾。「中統」歷史早於「軍統」，原本以為可以集萬千寵愛於一身，但歷代統治者皆喜歡以雙軌策略分而治之，尤其像情報工作這種特殊機構，更需要有一個制衡或競爭的對象。「軍統」的出現，或多或少帶有這樣的成分。「當調查科發現戴笠在做類似工作的時候，科中同仁憤憤不平，謂蔣公是否不信任而另派戴笠去做？」<sup>135</sup>因此，顧順章觸怒了調查科，犯了忌諱。

<sup>132</sup> 孟慶樹編著，《陳紹禹—王明·傳記與回憶》（莫斯科：本體心理學慈善基金會，2013年），頁104-105。

<sup>133</sup> 王思誠，《曠世風雷—夢痕—九十年人生經歷見證》，頁121。

<sup>134</sup> 徐恩曾，《我和共黨鬭爭底回憶》，頁20。

<sup>135</sup> 陳立夫著，張緒心、馬若孟編述，卜大中譯，《撥雲霧而見青天：陳立夫英文回憶錄》，頁134-135。

國民黨特務工作有一項要求，「他本身只是一種黨內無名英雄的革命工作，而決不是以此為爭奪政治地位武器的工作。凡是從事國民黨特工的只是對黨及領袖一種忠誠的表示，此外一切須犧牲。」<sup>136</sup> 雖說這樣的要求放在現實層面上有點諷刺，畢竟「中統」一直被陳果夫（1892-1951）、陳立夫視為禁臠，是C. C.<sup>137</sup> 維持黨內地位的重要工具。「哪個地方有C. C.，哪個地方就有調查科分子；哪個地方有調查科分子，哪個地方就有C. C.。」<sup>138</sup> 顧順章終歸是外人，「他沒有政治上高的地位，他沒有單獨可以指揮支配的人事及機構，他完全不瞭解本身的缺點」。<sup>139</sup> 張永琴曾經回憶稱：「以前顧順章曾給我講過蘇聯如何好，共產主義制度好的話（即使他投靠了國民黨，他還是看不起國民黨那一套的）。」他是這樣的自負，「對眼前現狀處境感到不愉快，對前途表示悲觀」。<sup>140</sup> 加上對政治的幼稚，讓顧順章異想天開，當他企圖組建「新中國共產黨」那一刻起，就觸碰到蔣中正的紅線。在蔣中正眼中，特務人員僅是「領袖的耳目與工具，只以絕對服從為天職，自己的生命身體，都已經完全貢獻於領袖，那麼，個人的意志，當然更不待說是沒有絲毫的自由了。尤其對政治方面，不能在領袖主張之外，自己作一點主張」。對於這樣的人，蔣中正要求他們，「祇有死心踏地的絕對服從主官的命令，隨時準備為領袖犧牲自己的一切，主官要你們死就死，要你們活就活，毫沒有你們抉擇的餘地」。<sup>141</sup>

顧順章是中共「轉變」分子，是「領袖所用的革命工具」，這樣的「工具」曾為了活命而背叛過往同志，事後又妄想成立新的政治組織，顯然嚴重犯了大

<sup>136</sup> 「中共特務部部長顧順章之自首及其與中共之打擊」，中央調查統計局編，《有關顧順章等破案經過》，檔號：276/7435/59400。

<sup>137</sup> 指國民黨內以陳果夫、陳立夫兩兄弟為首的派系，取二人英文姓氏之首字母，故名C. C.。但關於這一點陳立夫本人則一直否認。參見陳立夫著，張緒心、馬若孟編述，卜大中譯，《撥雲霧而見青天：陳立夫英文回憶錄》，頁609-610。

<sup>138</sup> 劉不同，〈國民黨的魔影——“CC”團〉，《文史資料選輯》，第45輯（1980年12月），頁243。

<sup>139</sup> 「中共特務部部長顧順章之自首及其與中共之打擊」，中央調查統計局編，《有關顧順章等破案經過》，檔號：276/7435/59400。

<sup>140</sup> 孫曙，〈顧順章後妻張永琴訪談錄〉，《文史精華》，第5期，頁25、28。

<sup>141</sup> 蔣中正，〈特務工作人員之基本修養〉（1935年1月1日），收入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13卷：演講（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研究會，1984年），頁7。

忌。蔣中正提到過：

既然志願來做一個特務工作人員，便要犧牲個人一切的自由而貢獻於團體，絕對服從主官的命令，遵守主管的意旨。如果你們能夠誠心服從，不怕艱苦，不畏犧牲，就可以繼續幹下去；如果要想自由，貪圖安樂的話，便可以離開，不必再留。<sup>142</sup>

「必須絕對服從命令」與「不許自作主張」，是蔣中正對特務工作人員的兩項要求，兩項重要準則。<sup>143</sup> 國民黨特務無論是「中統」亦或者是「軍統」，都與顧順章淵源頗深，不少人是他訓練出來的學生。加上調查科組成分子中，中共「轉變」人員占了極大比例，顧順章原先在中共黨內有極高的地位，這就讓他有相當的發言權。那麼，如果哪天顧順章有了異心，這些他的學生、以往的同志會不會也一呼百應呢？根據黃凱的回憶稱：「自首人劉英等向徐恩曾檢舉顧順章招兵買馬，企圖組織新中國共產黨，並蓄謀把千人行動大隊作為他的武裝基礎，聚眾起事，消滅包括老蔣在內的黨政要員。」<sup>144</sup> 中共「轉變」分子陳蔚如也提到顧順章曾經對他說：「要另成立新共產黨組織。從現在起就要注意聯繫自首人，把他們團結在一起。」<sup>145</sup> 這些曾經背叛自己組織的人要是團結起來那豈不是成為嚴重的禍害？

至此，顧順章已到非殺不可的地步。據徐恩曾說法：「我所以為遺憾的這位初期反共鬥爭中具有特殊貢獻的朋友，不曾和我合作到底，在一九三五年的春天，因和敵人重新勾結而被處刑。」顧順章最終是以「通共」名義遭到槍決。但很難想像一位家人幾乎被中共殺戮殆盡的人，會再重新投靠共產黨？中共也真的會大公無私，摒棄前嫌接納這位手上沾滿共產黨人鮮血的人？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也或許是中了中共的反間計？

<sup>142</sup> 蔣中正，〈特務工作人員之基本修養〉（1935年1月1日），收入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13卷：演講，頁7-8。

<sup>143</sup> 蔣中正，〈特務工作人員之基本修養〉（1935年1月1日），收入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13卷：演講，頁6-7。

<sup>144</sup> 黃凱，〈我的特工生涯和所見所聞〉，《江蘇文史資料》，第45輯，頁6。

<sup>145</sup> 陳蔚如，〈我的特務生涯〉，收入張國棟等著，《特工總部—中統》（香港：中原出版社，1988年），頁187。

在勾結共產黨問題上，調查科曾破獲中共在上海某一地下機關時，尋獲若干國民黨中央及調查科內部情報，據被捕的共產黨員稱：「那是我們中央特工總部方面很有地位的轉變分子供給的，當時研究其內容很懷疑是顧順章所供給，因為關係甚大，不願深究，以免影響轉變同志的心理，此後更有一個重要的自首同志余飛報告，這些確是出之於顧順章的供給，於是我們開始注意他的行動」。<sup>146</sup> 在1933年6月24日，史濟美被中共特科槍殺，顧順章被懷疑涉入此案。史濟美係顧順章所培訓人員，調查科上海區的創立亦是顧順章所建議。所以說顧順章對調查科在上海的部署是知根知底的，否則很難想像身為調查科上海區負責人的史濟美行蹤會為中共所知悉。<sup>147</sup> 9月24日，戴笠呈給蔣中正報告稱：

共黨龔麟書係共黨特務，負責人之顧順章亦能證明，於刪日〔按：十五日〕在滬曹家渡附近為生工作人員槍傷逮捕，但被滬公安局扣留。現在紅十字會醫院醫治迭經交涉，迄未解京。當此共黨特務隊在滬迭犯暗殺案件之時，擬乞電令滬公安局將龔麟書迅速解京，以便審究或可得到線索藉破共黨之特務機關。<sup>148</sup>

經過此事後，顧順章被徐恩曾派人嚴密監視。調查科幹事顧建中（1906-1963）曾拿槍指著顧順章警告說：「再不好好幹，槍斃你！」<sup>149</sup> 這也導致顧順章與徐恩曾矛盾嚴重激化。

而壓倒顧順章與徐恩曾關係的最後一根稻草，則是林金生的告密。「這個林金生是二十餘歲的青年，是顧順章自己挑選訓練的自首分子，他平日對林甚好，論情理是應該可靠的，但是我們還是很寬容他的。此後林又來報告說顧順章背叛組織勾結共黨行跡更顯然了再不能拖延」。<sup>150</sup> 林金生提到顧順章曾對他說：「你

<sup>146</sup> 「中共特務部部長顧順章之自首及其與中共之打擊」，中央調查統計局編，《有關顧順章等破案經過》，檔號：276/7435/59400。

<sup>147</sup> 陳蔚如，〈我的特務生涯〉，收入張國棟等著，《特工總部—中統》，頁144。

<sup>148</sup> 「戴笠電蔣中正」（1933年9月22日），〈一般資料—民國二十二年（五十三）〉，《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80200-00123-006。

<sup>149</sup> 「中共特務部部長顧順章之自首及其與中共之打擊」，中央調查統計局編，《有關顧順章等破案經過》，檔號：276/7435/59400；孫曙，〈顧順章後妻張永琴訪談錄〉，《文史精華》，第5期，頁26。

<sup>150</sup> 「中共特務部部長顧順章之自首及其與中共之打擊」，中央調查統計局編，《有關顧順章

是個神槍手，我要配12個人給你，成立一個特務隊，由你任隊長。他還說：『我們首先要把陳立夫和徐恩曾幹掉』。」這樣的舉動讓林金生感到「很害怕」，因此他「跑到徐恩曾那裡告發他」。<sup>151</sup> 關於這一點，張永琴是如此回憶：「一次顧要林替他送一封信給戴笠，林為償還賭債，便將信拿給徐恩曾，以討得賞錢還債。」<sup>152</sup> 顯然林金生想利用顧與徐之間的矛盾，從中獲取利益。1934年11月20日，時任北平憲兵副司令蔣孝先（1900-1936）在呈給蔣中正報告中，便提到顧順章重新與中共產生聯繫。在查獲中共特科潛伏在國民黨內部人員潘冬舟相關訊息中，發現「潘與自首分子顧順章等曾有秘密結合與留俄生及黃浦〔埔〕同學亦有複雜關係，殊為危險，擬請轉令拿辦，以杜亂萌。」<sup>153</sup>

顧順章最終在林金生的指認下，對「背叛組織勾結共黨」的罪名，「俯首認罪」。徐恩曾便呈請蔣中正，將顧順章發往江蘇省保安司令部審訊，後「依法判決死刑，執行槍決」。顧順章就在「通共」的罪名下，結束了自己傳奇的一生。事後調查科是這樣評價他的：「在中共特務部長顧順章自首及予共黨打擊之經過，然而野性難馴，終於至自投羅網。國民黨中央特工同志無法感化此一重要共黨，亦自承失敗也。」<sup>154</sup>

## 陸、結語

「中統」與「軍統」是構成國民黨特務組織的兩大支柱，是蔣中正用來維繫政權的兩個重要工具，是打擊共產黨的兩把武器。有趣的是，本該與共產黨勢不兩立的組織，卻與中共「叛徒」唇齒相依。在顧順章「叛變」之前，中共在與國

---

等破案經過》，檔號：276/7435/59400。

<sup>151</sup> 林金生，〈顧順章被殺真相〉，《江蘇文史資料》，第45輯，頁66。

<sup>152</sup> 孫曙，〈顧順章後妻張永琴訪談錄〉，《文史精華》，第5期，頁26。

<sup>153</sup> 「蔣孝先電蔣中正」（1934年11月20日），〈一般資料—呈表彙集（十六）〉，《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80200-00443-134。

<sup>154</sup> 「中共特務部部長顧順章之自首及其與中共之打擊」，中央調查統計局編，《有關顧順章等破案經過》，檔號：276/7435/59400。

民黨的地下鬥爭中，占據一定的優勢，畢竟顧順章直接受過蘇聯克格勃完整的訓練，加上在清黨後中共相對弱勢，在生死存亡之際，保衛黨的特科戰鬥力自然不差。對比國民黨呢？雖站在制高點上，但陳立夫、徐恩曾乃至於張冲等領導人，皆沒有特務工作經驗，故難有突出的表現。不過一切情況在顧順章「轉變」後有了不一樣的局面。在顧順章的協助之下，調查科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特務系統，加上陸續有中共「轉變」分子的加入，使得國民黨對共產黨有更進一步的瞭解，形成一定的戰鬥力。

其實這場中共黨人「自首自新」的「轉變」風潮，最主要還是源自於中共黨內路線紛爭的問題。王明等留蘇學生取得黨中央領導過程略顯粗暴，使得中共六屆四中全會的召開一直為人所詬病。正是這場對於革命路線的衝突，進而導致黨內發生忠誠問題，顧順章是顯著的例子。不過有賴於周恩來的應變得當，才讓局面不至於惡化。中共特科在周恩來的整合之下，重新站穩腳跟，對國民黨乃至於中共「轉變」分子展開反擊。

顧順章則在「轉變」後協助國民黨完善特務組織，「中統」裡有不少人就是他所訓練培育。但他的野心過於龐大，將自己陷入進退兩難的窘境，而成為國共兩黨眼中的危險與麻煩。在國民黨眼裡，顧順章是共產黨「轉變」分子，這樣的人是不能完全信任的。畢竟，有哪個政黨會真正無私地包容曾經叛離原組織的人？既然都能背叛自己同志，那麼難保這樣的人不會再次變節？這一點從調查科一直派人監視顧順章可以看出。但他如果選擇低調，甘心做一個沒有聲音的人或許會有好的結果。顯然，以顧順章性格不可能選擇默默地度過一生。在信仰上，相信顧順章對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與瞭解有其侷限，否則他應該會像中共黨人宣稱的那樣選擇「慷慨赴義」或是「寧死不屈」？顧順章出身底層，是工人階級、幫派分子，過於自負與政治天真的性格，也限制了他的人生格局。

在國共鬥爭年代裡，「自首自新」政策確實在中共相對弱勢中起到了極大的作用，大批共產黨人「轉變」投靠到國民黨陣營。中共也意識到這是對其革命最毒辣的武器。面對國民黨的「自首自新」策略，中共發展出一套黨員忠誠教育，這是因顧順章的「叛變」所換來的「血的教訓」。這項教育的核心精神，便是要求每一位黨員生命與信仰無法兼顧時，就必須發揮「無上布爾塞維克的堅定性，

頑強性，絕不屈服的氣概，以及最後那種慷慨赴死，從容就義的犧牲精神」。<sup>155</sup> 周恩來更是強調共產黨人必須要有為革命獻身的決心和勇氣。在往後日子裡，或多或少遏制了黨員的出走或「叛逃」，讓國民黨「自首自新」政策成效有限。日後中共在歷經「長征」的洗禮，與延安整風運動的審幹，中國共產黨在黨員忠誠問題上得到很大的改善。誠如周錫瑞（Joseph W. Esherick）所言：「長征本身（或是共產黨歷史上其它的重大分水嶺）從歷史上升為傳奇，倖存者更加忠誠地呵護著這類神話與他們自己在其中的角色，以保證他們的貢獻能夠成為革命勝利的光輝敘事中的一章。」<sup>156</sup> 這也解釋了，為何「中統」在抗戰期間較少能成功打入中共內部的案例，且少有共產黨人的投誠「轉變」。這就不難理解，共黨郭潛<sup>157</sup>的「叛變」會被「中統」視為抗戰期間最大戰果之一。

---

<sup>155</sup> 內政部調查局編，《中共秘密工作之研究》（1942年），法務部調查局藏，檔號：276.1/815/10822。

<sup>156</sup> 周錫瑞，〈關於中國革命的十個問題〉，收入董玥主編，《走出區域研究：西方中國近代史論集粹》，頁199。

<sup>157</sup> 郭潛，後改名郭華倫，曾任中共南方工作委員會組織部部長，1942年遭「中統」逮捕，「轉變」投靠國民黨。他的「轉變」導致中共在華南地區的工作嚴重受挫。

## 徵引書目

### 一、檔案

- 《蔣中正總統文物》（臺北，國史館藏）  
〈一般資料—呈表彙集（十六）〉。  
〈一般資料—民國二十二年（二十八）〉。  
〈一般資料—民國二十二年（五十三）〉。  
〈種種不法罪行（一）〉。  
《嚴家淦總統文物》（臺北，國史館藏）  
〈任總統時：函（六十六年）（一）〉。

### 二、史料彙編

- 王健英編，《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匯編—領導機構沿革和成員名錄》。北京：紅旗出版社，1983年。  
（中共）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6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譯，《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1927-1931》，第9、10卷。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年。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譯，《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1931-1937》，第13卷。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年。  
中國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編，《中國共產黨之透視》。臺北：文海出版社，1982年影印本。  
立法院編譯處編，《中華民國法規彙編》，第11-12編。南京：中華書局，1934年。  
安徽反省院編，《安徽反省院概覽》。安慶：編者自印，1935年。

### 三、調查報告（新北，法務部調查局藏）

- 王鳳飛，《王鳳飛反四中全会的意見》（1931年1月26日）。

- 小林，《四中全會前後共黨分離情形》（1931年3月）。
- （中國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編，《轉變》（1933年12月）。
- （中國國民黨）中央調查統計局編，《有關顧順章等破案經過》。
- （中國國民黨）中央組織部特務組調查科編，《周恩來殘殺顧順章家屬及異己分子三十餘人埋藏上海租界區域之發現》。
- 中國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編，《兩年來之中國共產黨（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三）》（1933年7月）。
- 內政部調查局編，《中共秘密工作之研究》（1942年）。
- 徐恩曾，《徐局長告全體同志書》。
- 閩粵贛邊省委編（中共閩粵贛邊省委組織部），《關於自首自新決定的通知》（1937年10月15日）。
- 廣東省調查室編，《東江共黨密件》（桂字第65號，1940年4月28日）。
- 顧順章，《特務工作之理論與實際》（1933年7月20日）。
- 蔣中正，《情報工作與完成革命事業的關係》（訓詞，1933年4月24日）。
- C. Y. 江蘇省委會編，《緊急通知—關於秘密工作》。
- C. Y. 江蘇省委，《江蘇省委關於四中全會的決議》（1931年1月23日）。

#### 四、年譜、言論集、回憶錄、文史資料

-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周恩來年譜（1898-1949）》。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20年修訂本。
-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 王思誠，《瞻園憶舊》。臺北：展望與探索雜誌社，2003年。
- 王思誠，《曠世風雷一夢痕一九十年人生經歷見證》。臺北：立華出版公司，1995年。
- 孫曙，〈顧順章後妻張永琴訪談錄〉，《文史精華》，第5期（2003年5月）。
- 徐恩曾，《我和共黨鬥爭底回憶》。臺北：編著者自印，1953年。
- 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13卷：演講。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研究會，1984年。
- 張國燾，《我的回憶》，第3冊。北京：東方出版社，1998年。
- 郭德宏，《王明年譜》。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
- 陳立夫，《成敗之鑑：陳立夫回憶錄》。臺北：正中書局，1994年。

- 陳立夫著，張緒心、馬若孟編述，卜大中譯，《撥雲霧而見青天：陳立夫英文回憶錄》。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2005年。
- 陳修良，〈我所經歷的立三路線的失敗—回憶錄《我走過的道路》（五）〉，《世紀》，2020年第2期（2020年2月）。
- 黃凱，〈我的特工生涯和所見所聞〉，《江蘇文史資料》，第45輯（1991年9月）。
- 萬亞剛，《國共鬥爭的見聞》。臺北：李敖出版社，1990年。
- 鄭伯克，《白區工作的回顧與探討：鄭伯克回憶錄》。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7年。
- Hsu, U. T. (徐恩曾) *The Invisible Conflict. Hong Kong: China Viewpoints, 1958.*

## 五、雜誌、報紙

- 《中外問題》，上海，1936年。
- 《申報》，上海，1931年。
- 《兵運材料》，1933年。
- 《社會新聞》，上海，1933年。
- 《紅旗半月刊》，上海，1933年。
- 《紅旗週報》，上海，1931年。

## 六、專書

- 丁易，《明代特務政治》。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
- 王健民，《中國共產黨史》，第1-3冊。臺北：漢京文化公司，1988年。
-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第1卷（1921-1949），上冊。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
- 司法行政部調查局編，《本局歷年殉職殉難烈士事略》。臺北：編者自印，1957年。
- 金沖及主編，《周恩來傳》，第1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20年1月第3版2刷。
- 孟慶樹編著，《陳紹禹—王明·傳記與回憶》。莫斯科：本體心理學慈善基金會

出版，2013年。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上、下冊。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1年修訂版。

馬振犢，《國民黨特務活動史》，上、下冊。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修訂本。

張文（張國棟）等著，《特工總部—中統》。香港：中原出版社，1988年。

郭華倫，《中共史論》，第1-4冊。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1973年。

楊奎松，《“中間地帶”的革命—國際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

## 七、期刊論文、專書論文

沈安娜，〈教導勉勵永記在心—憶周恩來指導我做情報工作〉，《黨的文獻》，第1期（1998年1月）。

周錫瑞（Joseph W. Esherick），〈關於中國革命的十個問題〉，收入董玥主編，《走出區域研究：西方中國近代史論集粹》。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

林金生，〈顧順章被殺真相〉，《江蘇文史資料》，第45輯（1991年9月）。

林威杰，〈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前後的黨內派系衝突〉，《展望與探索》，第17卷第9期（2019年9月）。

林威杰，〈特務、叛變與轉變：國共鬥爭下的顧順章案〉，《政大史粹》，第32期（2017年9月）。

祝韻雅，〈中統頭目徐恩曾〉，《文史資料選輯》，第11輯（1987年7月）。

張國棟（張文）原作，〈細說中統局（上）〉，《傳記文學》，第55卷第2期（1989年8月）。

陳永發，〈延安的「革命鴉片」毛澤東的秘密武器〉，《二十一世紀》，2018年8月號（總第168期）。

劉不同，〈國民黨的魔影—“CC”團〉，《文史資料選輯》，第45輯（1980年12月）。

劉曉，〈黨的六屆三、四中全會前後白區黨內鬥爭的一些情況〉，《中共黨史資料》，第14輯（1985年5月）。

蔡孟堅，〈兩個可能改寫中國近代歷史的故事〉，《傳記文學》，第37卷第5期（1980年11月）。

Esherick, Joseph W. (周錫瑞) “Number Games: A Note on Land Distribution in Prerevolutionary China,” *Modern China*, 7:4 (Oct. 1981).

